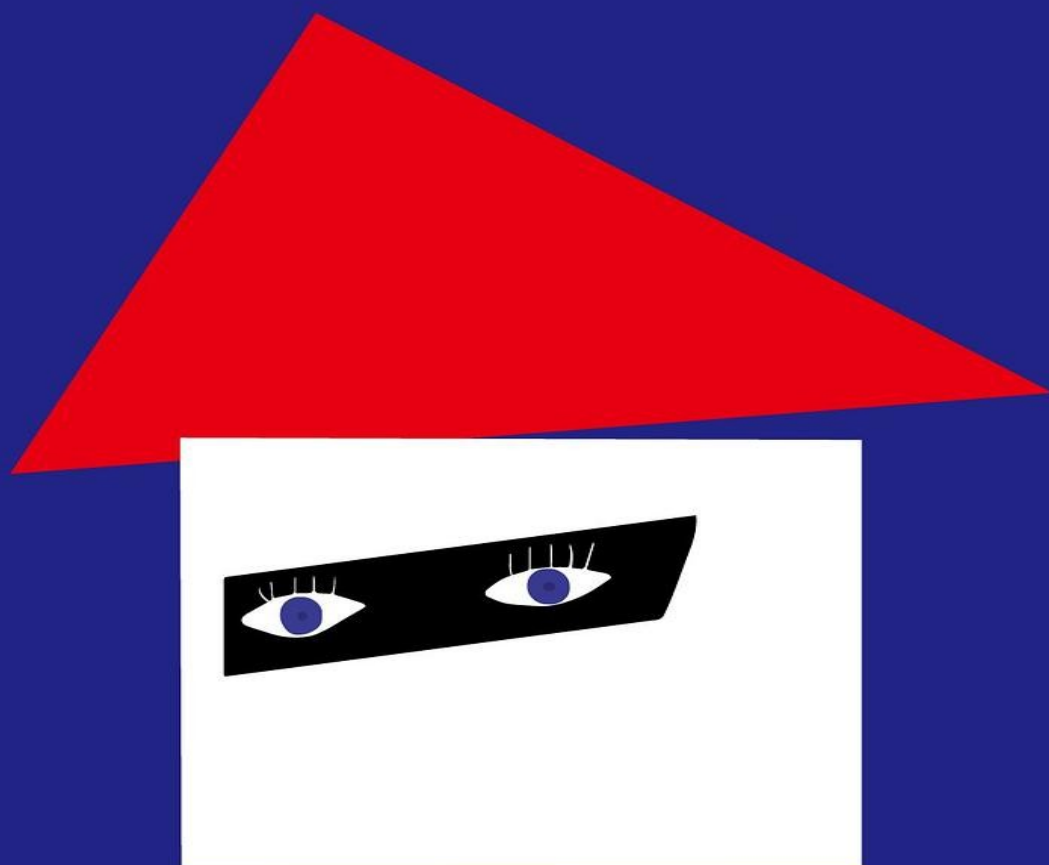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Cover Image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作者：【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邱丹丹译

译者：邱丹丹译

出版社：岳麓书社·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26年06月

ISBN：9787553824277

字数：69千字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org)

献给埃里克与小家伙们

比皮靴的喧嚣更可怕的，
是拖鞋的沉默。

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

序章 从奥勃洛莫夫说起

Ivan Gontcharov, Oblomov, 1859, édition de Pierre Cahné, Folio classique, Gallimard, 2007.

奥勃洛莫夫（Oblomovest）是19世纪中叶圣彼得堡郊外的一位地主。他为人诚实正直，却天性慵懒。①他的生活空间，与其说是他的住所，不如说是长沙发；但若说是长沙发也不如那件宽大舒适的睡袍更为贴切；但这些最终却都不及那双“柔软宽大”的拖鞋。他的手指丰若无骨，全身松弛无力，举手投足间弥漫着一种优雅的慵懒。奥勃洛莫夫的大部分时光就这样在躺平中悄然消逝。对他而言，行走或站立不过是两次卧倒之间的短暂过渡：“每当他在家——他几乎总是在家的——便整日躺卧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房间里，那里既是卧室，也是书房，还兼作会客室。”奥勃洛莫夫恰如那种疲于思虑的优柔寡断者，光是想到那些必须完成的琐事，就足以令他心力交瘁。清晨他刚刚离开床铺，便立刻倒回长沙发上，一手按着额头，开始思考，反复思考，直到筋疲力尽，然后才心安理得地喃喃道：“为了公共利益忙到这种地步，今天也算尽职尽责了。”他写一封信，可能要耗费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还需要一整套繁复的仪式。每一个决定都像是一场永无尽头的心理马拉松。他的仆人扎哈尔表面恭顺，实则懒散至极，任由房子陷入一片狼藉。有时，奥勃洛莫夫甚至连床都懒得起，直到下午四点才微微睁开一只眼，不由得轻叹道，若换作别人，这么长的时间恐怕早就完成了许多工作。然而，这个念头本身就足以让他疲惫不堪，于是他再次闭上眼睛，沉入梦乡。奥勃洛莫夫成长于父母的溺爱之下，宛如温室中一株娇弱的植物。他的人生仿佛从一场“凋谢”开始：“从我最初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瞬间，我便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枯萎。”

当朋友斯托尔茨要为奥勃洛莫夫介绍一位年轻女性时，他立刻陷入了恐慌。仅仅是想到要与妻子共度余生、融入社交圈、阅读报纸、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就让他感到深深的畏惧。尽管他还是爱上了那位迷人的奥尔加——这位姑娘甚至主动承担起监督他白天不再睡觉的责任，还陪他进行长时间的散步——但他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将这段关系推向更深一步。奥尔加时常调侃他，试图帮他改掉那每日小睡的习惯，还不断责备他缺乏胆量、举止笨拙，甚至直言他是个懦夫，她最终对这件“松松垮垮的旧衣服”彻底失去了信心。面对各种压力和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奥勃洛莫夫最终选择了分手。即便到了30岁，他也始终处在“准备开始生活”的状态。这就是他的病症：嗜睡、拖延，以及意志的无力崩塌。

“当一个人不知为何而活时，生活便失去了方向，变成了漫无目的的得过且过。他只期待夜幕的降临，好用睡眠将那不怀好意的问题掩埋：过去的十二小时或二十四小时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度过的。”他无法去爱，无法旅行，更无法有所作为。不久，他便完全放弃了外出，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柔软的靠垫之中。他的佃农和亲近之人肆无忌惮地欺骗他，掠夺他那微薄的收入。直到他搬进了一间更小的住所，并爱上了那位皮肤白皙的房东太太，他依然轻易地就被对方的兄长愚弄了。

在奥勃洛莫夫那滑稽喜剧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对存在的不可能性的深刻描绘。主人公睡得越多，对休息的渴求就越发强烈。他从未体验过巨大的喜悦，却也因此避开了深沉的痛苦。他内心的那束微光，曾奋力寻求出口。它灼烧过“牢笼的壁垒”，却终究逃不过熄灭的命运。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始终未能真正迈出向前的步伐；因为向前迈进“意味着他必须一举抛下那件宽大柔软的睡袍——那件不仅保护了他的双肩，也庇护了他的灵魂与精神的袍子”。最终，他在“余生这宽敞的棺材中安然长眠，而这口棺材，正是他亲手打造的”。

1 天启四骑士

原书此处为Svletana Alexievitch，有误。——译注

为什么要在2022年重新提起奥勃洛莫夫？这位生活在既无奈飞（Netflix）亦无互联网时代的人物，成了封控时期的英雄，而他或许仍将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象征。躺平的男男女女，是我们，也是你们，在过去整整两年中，我们被迫过着贴地而行的生活。疫情既是一场矛盾凝聚的时刻，也是一个变革加速的阶段。它推动了早在其暴发之前便已显现的时代趋势：恐惧正压倒性地取得胜利以及正从被束缚的生活中涌现的悖论式的快感。疫情带来的居家隔离，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成了脆弱灵魂的避风港。冈察洛夫的小说或许并非列宁所批评的那样，仅是刻画“俄罗斯灵魂”，而是面向全人类的一场预言，它是一种警示文学，而非消遣的读物。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总能让人一读再读。这些著作仿佛早已预见了那些在多年后才显现的事件。俄国文学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映对压迫的抗争，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瓦西里·格罗斯曼

（Vassili Grossmann）、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Chalamov）、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和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Svetlana Alexievitch）^②的作品；另一种则弥漫着绝望与宿命的气息。二者如同镜中倒影，彼此相互映照。前者与后者都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了人类面对深重苦难时的勇气，以及对命运的屈服，甚至是对被奴役的热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的天才之处正是在于他能够平衡并调和这两者〕。无论哪一种，俄国文学的洞察力都至高无上，无法超越。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除了对数十亿人造成的冗长悲剧之外，它还再次掀起了关于谨慎与大胆、漂泊与居家、户外冒险家与室内探索者之间的激烈辩论。21世纪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为开端，如今继续面临气候失衡的威胁、新冠病毒的持续肆虐，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复杂局势。这一系列的灾难造成了我们称为“大倒退”（la Grande Rétractation）的现象。这些接二连三的创伤性事件，尤其是在西欧地区，对成长于和平与福祉环境中的年青一代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几乎毫无准备去应对逆境。20世纪末是一段在观念和出行方面都高度自由的时期。然而，这个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思想与空间的封闭已逐渐显现。尽管如今出现了面向百万富翁的轨道旅游，但就在不久前，跨越边境，甚至迈出家门，仍然是难以企及的事。新冠疫情如天劫般降临到一个对未来已失去信心的西方世界，而未来的几十年似乎只为验证其走向崩溃的宿命。疫情将所有焦虑汇聚于死亡的阴影之下，但它也不过是我们心态的一面镜子。

衰退主义与灾难主义，这两种当今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对求生的执念。我们被各种恐惧裹挟，这些恐惧无不以绝对优先的姿态争夺大众的目光。同时，我们目睹着多种末日叙事的竞逐——它们非但没有彼此抵消，反而层层叠加：疾病、极端高温、恐怖袭击，乃至敌人的轰炸，所有这些死亡途径任君挑选。套用丘吉尔（Churchill）谈及巴尔干地区的那句名言，我们过去二十年，经历了“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历史”。这无疑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时代，却伴随着深沉的痛苦与悲伤的余韵。

有多少人把回归正常视为一种冲击？禁令曾束缚过他们，而禁令的解除却让他们更加茫然失措。他们是否会怀念起当初愤怒诅咒的封控噩梦？如同那些获释后叹息不已的囚犯，他们竟会怀念牢房的铁窗，因为自由到来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的苦涩。这些人随时准备寻找任何借口，再次把自己关回牢笼。只要技术设备配备齐全，房间与家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观世界。与强制隔离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危险世界时那种主动选择的自我封闭。这个“牢房”里没有牢壁，没有锁链，也没有看守。那个狱卒就在我们脑中。这段慢生活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社会压力：社交接触减少、外出受限、聚会时间缩短、居家办公，没了上司的约束，人们得以享受穿着家居服甚至睡袍的慵懒日子，这种看似退化的生活方式却意外地带来了愉悦感。作为干扰者和诱惑者的“他者”被隔绝在外，消失不见了。对某些人而言，居家隔离竟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享受：宵禁、口罩、防疫手势，以及“一米五”的社交距离，这些虽令人不适，却也悄然为生活增添了秩序与规范。我们从对封闭空间的幽闭恐惧症，转变为对开放空间的广场恐惧症。疫情带来了深深的忧虑，却也缓解了我们更大的焦虑：对自由的担忧。在未来的几年里，自由或许将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甚至沦为场虚幻的梦境。

Les Échos, 22 mai 2020, 《ces jeunes actifs qui regrettent déjà le confinement》.

谁能预见，许多当代人竟会宽容地看待这种封闭的体验，甚至将其视为一场悠长的假期？^②不少人支持所谓的“间歇性封控”或“有条件开放”的模式。无数法国人和欧洲人不想再回到办公室，而是梦想着归隐大自然，过上简单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脱离历史洪流的束缚。安然无忧的时代已经落幕，负面情绪全面占据了上风。如今，人们通过“减法”来为自己定位：要么是少消耗、少开支、少旅行；要么站在反对的立场，否定一切，反疫苗、反食肉、反投票、反口罩、反核电、反通行证、反汽车。医学领域中曾单纯代表未感染艾滋病毒或新冠病毒的“阴性”一词，如今成了一种令人安心的积极象征，而“阳性”则被看作潜在痛苦的代名词。

然而，当新冠疫情暴发时，旧世界早已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只是我们尚未察觉。诚然，如今酒吧和餐馆人潮涌动，人们迫不及待地渴望重新拥抱生活；游客们蜂

拥而至，对“远方”的狂热让车站和机场不堪重负；各国人民展现了对战争受害者的声援与支持。这一切，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信号。生活本该尽情挥洒，若不能放纵挥霍，又何谈真正的生活？然而，疫情期间，一股“缩退”的力量却悄然占据了上风。我们的未来，终究将取决于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与微妙平衡。

《急不可待的患者》（*The Impatient Patient*），诺尔曼·麦克卡贝（Norman McCabe）于1942年导演的一部黑白动画短片。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耐心和急躁的故事，通过幽默的方式展现了不同人物在面对等待和耐心方面的不同反应。——译注

我们的对手，包括那些充满仇恨的斯拉夫主义者和极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纷纷谴责西方的堕落与衰败，认为这是由少数群体掌控权力，无节制的物质主义盛行以及宗教信仰日渐式微共同导致的。事实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做过类似的判断，但态度更加客观和理性。无论是对女性主义者与同性恋群体抗争的认可，还是盲目信仰的削弱，抑或是对一定程度舒适生活的保障，这些都不应被视为衰退的因素：相反，这些更应被看作文明的象征。我们可以批评过度的解放（如“觉醒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解放本身。然而，在西欧，尤其是法国，我们享有的合法照护却往往演变成一种慢性的不满情绪和令人厌倦的依赖心理。不论国家做了什么，永远显得不足；政府提供的各种救助反而加剧了我们的脆弱，使得我们开始将烦恼视为悲剧。当权利不断增加时，义务却在随之减少，这种不平衡催生了无穷无尽的诉求：“一切都是我应得的，而我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看看疫情期间的抗议，甚至是反对者引发的骚乱吧！他们打着自由的旗号，既要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又要求公共权力在他们遇到任何困难时都随时随地伸出援手：万事如意时切莫来扰，凡有事端便须尽责。现代病人如同《急不可待的患者》^①，对医学的局限性深感不满。“无法治愈”几乎成为我们字典中唯一的禁忌词。他们质疑医学界，要么不尽力，要么被经济利益驱使。科学进步得越快，人们对其不足和滞后的愤怒也就越强烈：既然可以治愈如此多的疾病，为什么不能攻克所有的疾病？从理性角度来看，竟有如此多的公民愤怒地反对那些本应拯救甚至保护他们的疫苗，实在令人震惊；有些人甚至对医生和护士施以暴力或生命威胁。更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反疫苗者，即使在病床上因未接种救命疫苗而命悬一线，也依然不忘继续诅咒疫苗。宁死不接种！

“旧世界”这一带有贬义的称谓，仿佛将它描绘为一个堕落的时代。这种说法让人觉得，这场疫情成了许多人眼中的道德净化试炼。一些禁欲主义者，甚至某些清教徒，都在这场试炼中验证了自身所持的偏见。街上依旧会人来人往，火车上总会人满为患，也总有人被探索未知的本能和追求远方的渴望驱动。然而，若恐惧的阴霾不断滋长，另一种趋势便会占据上风，那将是封闭与缩退的胜利。在时代洪流面前，那种因掌控无能的被剥夺感，使得回归家园的诱惑变得愈加难以抗

拒。正如20世纪中产阶级常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我的杯子虽小，但我只饮自己杯子里的水。疫情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逐渐常态化，并被纳入常见流行病的范畴。它将保持足够的传播力以困扰焦虑者，却又不足以严重到让无忧者感到不安。然而，疫情并不是我们所遭遇不幸的唯一来源，它拖曳着一只丑陋的随从，携带着种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一路走来。

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便是世界末日：战争冲突与自然灾害交织，一切似乎都在召唤人们暂停旅行，退守小型社区，静待大幕落下。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的回应似乎只有恐惧与退缩。集体恐慌的代言人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言论在这方面尤为发人深省：“我不要你们的希望，不要你们的乐观，我要你们感到恐慌，我想让你们感受到每天萦绕着我的恐惧。”（2019年，达沃斯论坛）衰退论与末日论的信徒试图将我们困囿于恐惧之中，使我们滞留于家中，并借此锁定年青一代的关注。无论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这只是早已根植于内心的一种心态的显现，而疫情不过恰好为其提供了验证的契机。“后疫情时代”会是什么样？它或许早已到来，那便是“内在世界”的时代，一个可能要伴随着诡谲新冠遗毒的时代。这个病毒或许永远无法彻底消失，它总是在不久后卷土重来，每次防疫措施的放松几乎都会引发新一波感染，甚至是新一轮疫情，而这往往又引发新一波的强制性措施。“内在”，成为这个时代独有的消极浪漫，它将“家”的归属感提升至一种几近原始的眷恋，宛如对母体、摇篮或子宫的依赖。新冠病毒不仅是疫情的始作俑者，更揭示了我们对于“外在世界”长期存在的敏感与排斥。这两年间，我们经历了一场反复无常的噩梦，既充满恐惧，又令人厌倦。而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会了洗手。可这所谓的“巨大进步”，终究难以描绘出一幅振奋人心的未来蓝图。

2 爱神的没落？

四十年前，艾滋病为生活下了紧箍咒：唯有自我防护，才能避免感染。幸运的是，唾液躲过了这场诅咒，成为幸福流动的象征，其交汇之时寓意着身体与心灵的融合。而安全套则为亲密结合提供了无感染的保障。这一看似简单的预防手段，拯救了数代人的生命。但如今，新冠疫情却截然不同：病毒飘浮于空气中，随时可能附着在你身上。你的伴侣或许只是与某个喘息的慢跑者擦肩而过，抑或在超市经过某位呼出致命微粒的顾客，就可能因此感染。于是，循环开启，诅咒降临：全世界的命运仿佛都悬于鼻腔中那根小小棉签的裁决之上。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气息（pneuma）是赋予生命的神圣之气。这一原初之气后来演变为基督教中的圣灵。现在，这气息却带着潜在的致命性：温热的呼吸能夺人性命。闻香识气，曾是爱意的心醉神迷，如今却化作了生死裁决。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彻底地扑灭激情的火焰？这场试炼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过往的幸福是何等珍贵，看似平凡的世界又是多么非比寻常。

我们失去了对普通感冒与常见冬季流感的坦然自若，这些曾是人人难免的小恙。现下，每逢喉咙微痒、鼻涕流淌，疑虑便悄然而生：这会不会是比感冒更严重的疾病？身旁但凡有人咳嗽，立刻就被当作需避之不及的麻风病人。

我们会不会发展出一种远距离的情爱艺术，推出一本医疗专家推荐体式的“新冠秘经”（coronasutra）？我们是否会正步入一个“肌肤相亲的荒漠”，在那里，欢愉只能透过冰冷的屏幕传递？就像1968年瓦迪姆（Vadim）执导的《芭芭丽娜》（*Barbarella*）中，简·方达（Jane Fonda）饰演的女主角仅用指尖与伴侣缠绵一样。如今，当一个令人心动的身影摘下口罩的那一刻，竟会透着一丝奇异的不安，仿佛这是一种裸露的开始。然而，那些令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在摘下口罩后也可能带来失望，因为那神秘的眼神与纯净的额头之下，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动人。公共生活早已退去了人际交流与商业互动的温度，逐渐沦为猜忌与怀疑滋生的温床。新冠疫情重新唤醒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恐惧：偏执狂般的“对他人的恐惧”与疑病症式的“对自我的恐惧”。后者是一种对自身身体的怀疑，仿佛它随时携带着致命的病菌或疾病。

某些文化对肢体接触的矜持早已习以为常：在亚洲，人们双手合十，鞠躬致意，这种行为源于对群体意识的天然直觉，而非我们所理解的“羊群效应”，更是一种数千万人共存共生的生活艺术。这些人潮如奔流的河川，或涨或落，却自有一种秩序、一种逻辑，甚至透露着一丝微妙的优雅。在北美，人们的问候更多是为了保持距离。他们的微笑并非为了开启对话，而是礼貌地提醒你留在原地：“我已留意到你，也请你尊重我的存在，继续走你的路。”如果你在那里试图用法式

热情拥抱一位刚认识的女士，她很可能会像被蟾蜍舔到一般迅速后退，而唯一能阻止她报警的，或许只有“文化差异”这一借口。至于他们所谓的“拥抱”，并非一种热情的相拥，而是一种保持距离的礼节性碰触：身体微微后倾，腹部收紧，尽量避免与对方有任何多余的身体接触。当然，在法国，“贴面礼”也正逐渐淡出。这对那些无法忍受双颊潮湿接触以及两三次，甚至四次响亮亲吻声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或许在未来，贴面礼只会存活于家庭圈子或亲密朋友之间，成为一种遗珍，甚至可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录。而这一切的最终赢家，则是那些厌世者，以及各领域中的清教徒。

在法语中，“masque”一词同时兼具“面具”和“口罩”的两种含义。——译注

然而，在拉丁或地中海文化的土地上，一种无法触碰、无法相拥的生活，又有何意义？我们生活在欧洲，一个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世界。而城市艺术的精髓，正是戏剧的艺术——将自己展示在众人面前，同时欣赏他人所呈现的精彩表演。彼此观察、相互评价，构成了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露天咖啡馆凝望街头漫步的人群，是一种令人陶醉的闲情逸致。在这个汇聚了不同民族、性别与年龄的巨大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既熟悉又独特的戏剧，其活力既让人着迷，又令人疲惫。人们通过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重新发现自身。然而，若每次警报响起，我们都不得不戴上布手套、护目镜和医用手套，这种城市美景将何去何从？当大街小巷被看不到面孔、装扮得像三流医疗剧配角一样的居民填满时，城市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这仿佛是一场以“露天医疗大厅”为主题的化装舞会。传统上，面具只是舞会或狂欢节上用来与他人互动的工具。而过去两年，尽管口罩^②的使用趋于减少，但它仍然将嘴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仿佛嘴已然成了一个令人不堪的器官。而赤裸的面孔则与“口罩一族”形成鲜明对立，仿佛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冒犯——怎么？！你竟然还敢展示自己的脸？在20世纪中叶得以解放的身体，而今却重新被遮盖起来：三十年前是安全套，如今是口罩、手套、护目镜、隔离服、一次性防护服、头罩，甚至包括那些已引发社会争议的穆斯林女性所佩戴的面纱与布基尼。

Le Monde, 8 mars 2020, 由Delphine Meillet et Marie Dose发起的请愿。

不仅如此，此前的一些社会演变早已为谴责情欲铺平了道路：所谓的“强势性别”早已蜕变为“嫌疑性别”。正如一百多位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一份请愿书中指出的那样，“在性犯罪案件中，一种令人不安的有罪推定正被过于频繁地引入”。^③这份请愿书还重申了无罪推定和诉讼时效的核心原则。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出生率的暴跌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此后略有回升）。人们爱欲

的衰退也同样不难理解，因为仅仅是简单的肌肤接触，就可能因纠纷而遭到指控，而且这还伴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女性权利觉醒的浪潮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当疫情防控措施与反性骚扰运动（#MeToo）的呼声交织在一起时，情欲也随之步入了不可信的时代。尤其是男性的欲望，已经被贴上了先入为主的负面标签，因为它被假定为暴力且极具攻击性。如果每个男人仅仅因为拥有一个阴茎就被视为“天生有罪”；如果每个男孩接受的不是教育，而是“再教育”，以赎清这所谓的“原罪”；如果每个年轻女孩都被灌输一种观念——所有异性恋关系本质上都是潜在的隐性强奸，那么年青一代选择禁欲或守贞，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第一次居家隔离期间，法国人的性生活陷入低谷，结合的渴望消失，in Jean-claude kaufmann, C' est fatigant, la liberté ... , op. cit., p. 46。至于这种渴望是否会重新燃起，尚待观察……

如果把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1968年拍的电影《偷吻》（*Baisers volés*）放到今天，它或许会被重新命名为《性骚扰企图》（*Tentative de harcèlement*）。与女性单独共乘电梯，手指轻轻触碰后背，甚至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如今都可能被视为骚扰（在美国，这种现象被称为“视奸”）。尽管对抗性侵是正义之举，但将诱惑或愉悦的细微举动罪恶化，却只会带来阻碍与压抑。此外，色情产品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位强势的“女教师”，以其编排精密、冷酷无情的表演，贬低了初学者那些笨拙却真诚的尝试，将他们牢牢困于手淫的牢笼之中。如今，情爱的语言已彻底披上了一层狂妄与敌对的外衣。人们不再是“分享愉悦”，而是在“对抗中寻求欢愉”：对抗男人、对抗父权、对抗资本主义，甚至对抗敌对的群体。享受不再是与他人共享的幸福瞬间，而是蜕变成了一把指向世界的剑，带着防御与敌意的锋芒。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情欲领域显现出分裂与宗派化。甚至连广为人知的“字母汤”——性少数群体（LGBTQI+++）也演变为一场硝烟四起的战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分庭抗礼，女同性恋与跨性别者相互角力，随之而来的是指责、诅咒甚至死亡威胁。当代的纵欲主义，早已掺杂了苦涩的蜜糖；而对身体的崇拜，则戴上了教条主义的丑陋面具。无论他们信奉何种教义，效忠于何种信条，那些对情欲进行审判的人始终比比皆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高喊“要做爱，不要作战”（*Faites l' amour, pas la guerre*）；而如今，做爱却已沦为一场各方相互攻伐的战争。那种因肌肤相亲而迸发愉悦的念头早已烟消云散。性，早已不再是追求快感的享受，而是化作一根打击他人的大棒。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趋势，或许不是感官的失序，而是官能的全面崩塌。^⑤未来是否会出现两个全新的群体：自愿守贞女与主动阉割男，他们高举禁欲与无性化生活的大旗？这场原本应当炽热燃烧的革命，却最终走向了苦涩与失落的结局。其中的风险在于，我们或将丧失对情欲之美的理解。爱神依旧是联结分离者的生命之力，是我们共享的“普世语言”，是那道迅疾而炙热的火花，令肉体相互碰撞、交融。

人类两性关系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错综复杂：独立并不意味着安宁。两性关系或许没有变得更加轻松，但却更具张力，它让一对（几乎）势均力敌的个体处于对立的两面。我们无法确定，随着男女之间的不断调和与法律条文的日益完善，两性能否真正实现和解，并在某些共和原则的框架下和谐共处。然而，职责分工、解剖学上的先天差异以及职业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始终阻碍着这一理想化的和谐。性别歧视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随之消失。每个性别对于另一个性别而言，始终是一个难以参透的谜。彼此之间，既非想象中的那般遥远，也不如认知中的那样亲近——它既是恐惧的根源，也是惊叹的起点。这种双重复杂性使得任何一段关系都无法摆脱暧昧的本质，在吸引与畏惧之间徘徊不定，模糊而难以厘清。正因如此，男女关系一如既往地交织着那些被反复证伪却又不断被印证的陈词滥调。这些矛盾的观念，既是双方敌意的催化剂，也是相互吸引的基础。两性之间（以及性少数群体之间）的纷争或许永远无法彻底平息。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让它摆脱极端分子的操控，避免滑向无休止的对立与敌视。纵然误解与挫折如影随形，我们仍须竭力守护那种情欲与爱意交融的微妙氛围。正是这种氛围，让当今的欧洲成为高度文明的精神家园。

新的性逃避现象，是一种对他人的过敏反应。这种疏离的真正悲剧在于，某一天我们不再追寻爱与欲望，那连接我们与生命的双重神秘源泉便会悄然干涸。与性欲相对的，不是禁欲，而是对生命的深切倦怠。

3 不可触及的远方？

帕斯卡（Pascal）曾言：“人类所有的不幸，皆因不知如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进一步阐述道：“因此，人们才如此迷恋喧嚣与躁动；也因此，监禁才成为如此残酷的惩罚；而因此，孤独的乐趣，对许多人而言，简直不可理解。”但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反驳：未来，人类所有的不幸，或许皆因他们不再愿意踏出自己的房间。那时，威胁他们的将不再是病毒，而是无所作为；困扰他们的也不再是疾病，而是无聊至死的倦怠。即便帕斯卡可能并不认同，但娱乐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琐事也是至关重要的，旅行更是不可或缺的。若没有这些打断日常生活的插曲，我们的存在将迅速沦为了一场苦修。像帕斯卡这样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人未曾预见的是，除了对无神眷顾的人类不幸进行沉思，或借助消遣寻求短暂的慰藉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行动与工作。

乔治·库特林（Georges Courteline），法国剧作家。善于针砭时弊，作品讽刺性强，既有对官僚机构的揭露，又有对人性缺点的鞭挞。代表作有《布罗什》《和睦家庭》等。——译注

埃及十灾（dix plaies d'Égypte）出自《圣经·出埃及记》，神降临灾难给埃及，劝说法老还以色列民以自由。十灾包括了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和长子灾。——译注

阻碍与繁杂精准地概括了我们当下的处境：能复杂为何要简单？就这样，曾经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无比；而原本困难的事情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要在吧台或露台喝上一杯咖啡，必须持有通行证；买根法棍，必须佩戴口罩；去超市购物时，队伍之长仿佛回到了冷战时期的苏联。至于出国旅行，如果手续稍有不全，便会遇到重重阻碍，甚至连办个护照都难上加难。旅客流动要满足一系列日益严苛的条件，而这些限制仍在持续升级。禁錮的范围已扩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回归从前几乎成了奢望。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在线表格、数不清的证明材料、应检必检的筛查，以及无处不在的二维码。新冠疫情不过是推动日常生活和人员流动管控升级的一个阶段。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仿佛随时随地在犯错。在过去两年里，法国展现了一种堪比“库特林^①式天才”的创造力，打造了一个由禁令、限制、有限许可和非强制性约束交织而成的繁复的官僚迷宫。这一切还辅足以令语言学家欣喜若狂、令公众瞠目结舌的术语与创新词汇。当然，这场荒诞并非法国独有，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于这场行政噩梦。我们并未如某些失去理智的人所言，陷入独裁，而是经历了一场由凌乱的即兴发挥所带来的动荡。在应对危机方面，民主制度依然展现了其灵活性和优越性。同时，事实也证明，人民愿意为了自身安全而牺牲部分自由。面对疫情，唯一合理的选择似乎就是留在家中。总会有千百个理由让世间男女心甘情愿地躲在国家仁慈的监管

和庇护之下，正如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的如“埃及十灾”^②般的重创：北半球因恐惧而自缚手脚，南半球却因极度贫困而无力抗争。打开房门成了一种高危行为。门锁的双重意义也因此显露无遗：它既可以象征着一天辛劳之后的归家之安，也可以是转上两圈将外界侵扰拒之门外的屏障。家庭空间功能性的无限扩张，与公共空间的急剧萎缩，使我们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所拥所得、削减自己的所欲所求、压缩自己的所住所往。未来的人类将是一种与虚拟现实相匹配的“缩减化人类”。存在，或即隐遁。

第一次居家隔离尚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其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甚至透着一丝“别致”。彼时，人们仍相信它会是短暂的。然而，随后的封锁隔离却逐渐显现出“自证预言”（*prophétie autoréalisatrice*）的特质。这难道会成为我们的未来吗？一个由口罩、社交距离、疑神疑鬼和日趋严格的规章制度构筑的明天？两年多来，我们如同“身着睡袍的柏拉图”[列维纳斯（Levinas）评奥勃洛莫夫语]，热衷于讨论疫苗的有效性、大型制药公司的“阴谋”、政府的谎言以及集体生活的种种危险。居家隔离生活的安逸与受限生活的甘美，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方修道士的悠久传统实践——那种隐居修室的生活，如今不过是叠加了社交网络的元素。这种蜗居的快感如今被赋予了种种美德，仿佛成了对抗气候变化、不安全感以及世界诸多危机的良药。居家生活取代了精神生活。如今，人们必须保持“植物般的静止”以免遭受外界的批评，或被指责制造了过高的碳排放。世界重新封闭，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禁区”。背包旅行和搭便车的跨洲之旅，如今只能存在于乌托邦的幻想中。隔离意味着空间的收缩与时间的膨胀。而后隔离时代的世界则正相反：空间距离呈指数级上涨。穿越国境依然是一种壮举，宛如参加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障碍赛。“近处”变得遥远，“远方”则彻底变得望尘莫及。

以瑞典语“飞行羞耻”（*flygskam*）为例，这一概念由一些环保活动家推广，意在让人们因乘坐飞机而感到羞愧。为了避免加重温室气体的排放，航空旅行似乎被认为应当彻底取消。然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数据，航空业的碳排放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但这一事实似乎无关紧要——在有些人看来，当务之急并非与全球变暖作斗争，而是对整个人类进行惩罚。他们要把人类“钉在地上”，以便让我们接受一场刻骨铭心的教训。然而，比起向公众提出具体可行的目标，例如大规模植树、沙漠化土壤治理、住宅的节能改造，或学会逐步摆脱让独裁政权获利的化石能源，他们却只是一味地咒骂与指责，让那些不愿配合的人充满负罪感。现在，所谓“改变生活”，不过是将生活尽可能地减缩到最低限度。如果每个时代注定是对立势力的战场，那么今天，许多人则希望我们放弃未来，归依一种穴居人的道德观。提倡节制是一回事，但阻止出行或将驾车犯罪化则是另一回事。许多环保运动领袖警告，回归传统旅游模式将是一种荒谬的选择，因为它终将因过度成功而走向崩溃。普瓦捷的绿党市长莱奥诺尔·蒙孔迪伊（Léonore

Moncond' huy) 甚至主张, 为了地球的未来, 应当削减“儿童梦想”协会的补贴。该协会致力于帮助残疾儿童实现首飞愿望。在她看来, “航空不应再成为孩子的梦想”(2021年3月16日)。于是, 我们被要求脚踏实地, 紧贴地面生活。如今, 汽车、飞机、卡车、邮轮, 甚至巴黎街头的滑板车或轻骑都经历着一场审判。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或气候叙事, 最终总会沦为一种居家生活的道德劝诫。于是, 我们只能略带哀愁地清点那些以“保卫地球”“守护公共卫生”, 或以“捍卫如壕沟、吊桥、箭楼般的边境安全”为名而被剥夺的事物。自由已然变成一种负担, 唯有封闭的空间才能带来救赎。

公民们像土拨鼠般躺平不动, 既要躺着, 还得服从。哪怕是最轻微的违规, 或稍稍越界的放纵, 都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让地球因我们的过失而受伤, 并延缓其“痊愈”的步伐。于是, 限制个体消费以减少污染的“个人配额”概念应运而生。一种新的“低碳节俭贵族”开始崭露头角, 成为社会的新精英阶层, 而其他人则被迫以他们的行为为标杆, 谨言慎行。一位公立电台的评论员甚至提议, 男女在追求彼此时, 不应再依赖豪车或昂贵的珠宝, 而是通过展示自己的低碳排放成绩单来赢得青睐。这种“气候通行证”俨然已经成为融化人心的新方式。不久之后,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将配备一个“生态计”, 即一种生态温度计, 用来量化我们的每日碳债。看看法国最近推出的儿童环保意识游戏《零废品家庭》

(*Famille Zéro Déchet*): 这无疑是个绝妙的创意。但削果皮的故事和垃圾分类的演绎, 真的能够取代孩子们想象中的《妙探寻凶》(*Cluedo*) 或《智力棋盘》

(*Trivial Pursuit*) 吗? 如果欲望意味着占据比自身更大的空间(田纳西·威廉斯语, Tennessee Williams), 那么当欲望被迫接受“瘦身疗法”后, 还能剩下什么呢? 极度缩减自己所占的空间, 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各国人民、个人乃至家庭都在被这种碎屑情结吞噬。那些为气候游行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群, 宛如中世纪的自答者。他们更像是赎罪的受害者, 而非真正的政治行动主体。哀号、尖叫、哭泣——但随着抗议的进行, 这一切显得越发苍白无力。可以想见, 对于在灾难的阴影和恐惧的滋养下长大并深信自己是历史弃儿的这一代年轻人而言, 任何走出自己舒适圈的举动, 都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能量消耗。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或许将见证劳动生活的逐步减少。随着远程办公和社会福利的普及, 这一趋势在悄然推进。19世纪末, 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

(Paul Lafargue) 在其著作《懒惰权》(*Le Droit à la Paresse*) 中所提前颂扬的消费社会与强制性娱乐, 或许终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日常。这种想象带来了双重后果: 大量人口既贫困又无所事事, 只能靠日夜娱乐麻痹自己, 沉溺于屏幕前的自我催眠, 深陷不可避免的“休闲噩梦”; 工作, 这一现代人灵魂的“镇静剂”, 将沦为仅供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而闲暇则成为赤贫者的沉重包袱。附着于劳动本身的古老诅咒被彻底颠覆, 超级富豪们将炫耀他们夸张的工作时长, 声

称自己正超负荷运转，而其他人则徘徊于失业的边缘，依靠社会救济或最低收入勉强度日。至少在法国这样一个工资普遍偏低的国家，劳动或许很快就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专属于最富有的阶层，而平民则在无尽的娱乐中消磨时光。这一趋势随疫情的到来而进一步加速。在成衣领域，难道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家居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办公室服装的主导地位吗？而远程办公的普及，不仅将员工和管理层分散到法国的各个角落，还彻底瓦解了企业或办公室这一喧闹且充满人际交往的“蜂巢”式的环境。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人们不再谈论“改变”，而是将所有焦点都放在“拯救”上：拯救地球、拯救法国、拯救欧洲、拯救北极熊、拯救左派或右派。这种非此即彼的绝对二元逻辑，让一切折中的解决方案显得尤为可笑：非死即治。而要保护（一个景观、一处遗址、一种语言、一个国家），有时却需要突破常规，甚至彻底颠覆。曾几何时，人类的生活不过是一次从出生到死亡的简单的朝圣之旅。如今，我们却都处于转变的洪流之中：从童年迈向成熟，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从与生俱来的性别过渡到自我选择的性别。这种转变看似自然，仿佛婴儿长牙般理所当然。但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自认是流性人或非二元性别者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身份本身却又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桎梏。自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品质；它同样可以被遗忘，一代人的时间便足以让人失去对它的渴望。自由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新事物的可能，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由此感受到自身的独特与不可替代性。新冠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令整个世界陷入纷乱，还让中产阶级陷入贫困，摧毁了友谊，离散了伴侣，助长了家庭暴力，更导致肥胖率和宠物数量的激增，尤其是狗的数量暴涨。它让我们逐渐释怀了对自由的理想追求。既然未来只剩下令人难以承受的前景，那就让我们放慢今天的脚步，平息所有的冲动，束缚那涌动不息的欲望狂潮。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死水”，化作无人可以唤醒的沉寂之流。

Jean-Claude Kaufmann, *C' est fatigant, la liberté ...* , Éditions de l' Observatoire, 2021.

当代人类的普遍舞台，无非是坐在单人沙发或长沙发上，面朝一块屏幕——它成了我们抵御世界诸般恐怖的唯一屏障。屏幕上传递的信息，既过滤了外界的冲击，又深化了我们对居家生活的依赖。这便是当下人类活动的全景画卷，无论是在洛杉矶还是在北京，每个人都困守在自己的小屋、独栋住宅、公寓、庭院、蒙古包或地堡之中。在封控期间，我们的生活被压缩到客厅的几平方米之内，行动的边界被牢牢束缚在物理空间之中，只能通过数字媒介和眼球的转动“远行”。与此同时，睡衣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政治物件”（让-克劳德·考夫曼语^②），其象征意义丝毫不逊于骚乱者手中的砖块或公民手中的选票。脚踩拖鞋、身裹睡

袍，我们顽强地抵御着外界残酷的冲击。而这双拖鞋通过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与全球互联网相连，不只地球，甚至还勾连了宇宙与星际。但这就足够了
吗？我们是否真的仅满足于此？难道我们就如阿兰·苏雄（Alain Souchon）所形容的那样，“像一条被困在浴缸里的箭鱼”，唯一的选择就是不断地更换浴缸里的水？

我们虽然摘下了口罩，却可能染上了“缄默症”。以最美好的意图之名，我们被赋予了一种存在层面的“禁足令”。所谓的“卫生暴政”已悄然让位于居家暴政。别动！保持如柱子般的静止！不难发现，在大西洋两岸，对卫生政策的抗议多来自流动性职业群体，如普通车主和卡车运输司机——这一现象早在2018年法国“黄背心”（Gilets jaunes）运动中就已初露端倪。一种全新的人类类型正在浮现：他们蜷缩于狭小空间，却高度互联；他们既无须他人，也无须外部世界。当代技术的所有进步，正以“开放”之名，悄然推动着“幽闭”的实现。然而，对于那些曾饱受通勤之苦、办公室压抑气氛和领导监管束缚的人来说，渴望居家生活与远程工作的情绪，也并非难以理解。或许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解读兰波（Rimbaud）的名句：“真正的生活是缺席的”——“真正的生活，便是缺席的生活。”对于仍然珍视探索精神并看重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人而言，这无疑是双重的不幸：疫情不仅夺去了1800万至2000万人的生命，更以“自我缩减”的方式让我们被迫背负起一场象征性的赎罪。

曾几何时，人们深信理性能够帮助我们掌控整个地球与自然。正如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雷（Alexandre Koyré）所述，人类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经历了一次从封闭宇宙观到无限宇宙观的思想飞跃。然而，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似乎正在倒退，尽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看似无限，但边界却从家门口开始算起。无论是独处还是与家人相伴，每个人都困守在自己的房间或客厅，面对无休止的信息轰炸，将“外部世界”视为一切危险的根源。然而，“内在世界”也同样危机四伏：孤独的折磨、平庸的蚕食、令人窒息的无聊、存在的疲惫，以及心灵的迷雾，层层侵袭，将人压得喘不过气。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家中完成：通过外卖解决饮食；通过订阅服务和平台欣赏电影、音乐会和戏剧；通过数字教练进行健身；通过屏幕完成工作；甚至通过Tinder或Grindr等交友应用寻找临时伴侣。如今，连依靠传感器和吸盘与远方伴侣进行安全性行为都成了可选项。一切都“几乎”近在咫尺。然而，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差之毫厘”，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谬以千里”？

4 平庸的生活，是否值得追寻？

有关该主题，请参阅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具有启发性的著作：Éloge du quotidien, essai sur la peinture hollandaise du xviie siècle, Seuil, 2009。

同上书，第110页。

生活并非总如表面般的平凡日常，这种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隐藏着一个难解之谜。或许可以说，17世纪的弗拉芒画派见证了这一概念的诞生与巅峰。这一画派钟情于室内场景：厨房中的女人、写信的男人、哺乳的母亲、酣睡的士兵、沉浸于书本的读者——这些作品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艺术转折点的到来。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此前以宗教画和战争场景为主的艺术形式，聚焦于圣徒和英雄，完全遮蔽了日常之美。弗拉芒画派最大的革新在于，普通人首次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茨维坦·托多洛夫语^①）。黑格尔不是曾说过，新教的过人之处就是将信徒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吗？外界虽无序混乱，内心却宁静温柔，充盈着人类情感的细腻流转。在这些画作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微不足道的；被表现的一切，因其存在而变得珍贵。无论是市民、农民、工匠、士兵，还是妓女，他们都因其自身而具有价值。这是一场艺术与思想的双重革命：抬高平凡，贬抑高贵。那些最平常的活动——如刨芜菁、吹笛子、修理家具，甚至对镜梳妆——与国王的加冕礼或古典英雄的壮举并无高低之分。^②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赞美，构成了人与亲人共同成长的温馨背景：家中自有喜乐，家庭的价值值得颂扬。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内在矛盾，在艺术的光辉下熠熠生辉。这是普通人对杰出者的逆袭。这一早期的现实主义，正如尤金·弗罗芒坦（Eugène Fromentin）所言，表现出了一种“对真实的深情”，但这一形式后来却逐渐湮灭。这是平凡的伟大显现，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刻。那笼罩在人类感官世界上的诅咒，也在这短暂的一刻被解除。

平凡日常的生活却没能保住这种新鲜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日常生活变得既令人着迷又遭人摒弃。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流派，通过其精确细致的记述，以尖锐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从左拉到于斯曼，他们的描写总带着某种程度的谴责或贬抑，充满了对琐碎细节的迷恋。杜安·汉森（Duane Hanson）是一位20世纪60年代名声大噪，而今却鲜为人知的美国艺术家。他用玻璃纤维和树脂来雕刻普通市民的形象——超市收银员、穿着宽松短裤的度假者、修剪草坪的人、逛街的情侣等，并将这些雕塑散布于街头、公园等公共空间。这些作品以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准度再现，每个行走在街道上或公园里的人都可能会遇到自己的复制品，甚至情不自禁地想打个招呼。自称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杜安·汉森以这些作品打造了一座展现美国普通人的“格雷万蜡像馆”。其代表作《超市女士》（*Supermarket*

Lady) 塑造了一位脚踩拖鞋、头戴卷发器的家庭主妇，推着购物车在商场中穿行。在汉森的这些人物群像中，模特与真人的相似程度令人不安，甚至到了毛骨悚然的地步。它们与我们如此相像，以至于完全可以互换。然而，它们呆滞的双眼却好似来自另一个星球，露出一一种无可掩饰的忧伤，诉说着难以名状的空虚。这些无名氏可能是任何人：你、我、你的邻居，抑或是任何普通的男女。（正如格雷万蜡像馆的特色：将明星冻结在蜡像中，仿佛封存于冰川般，最终将他们化作一种匿名化的博物馆展品。）这种模仿已不再单纯，而是蜕变成一种扭曲的怪相。

经典的基督教宇宙观中世俗与神圣，尘世之邦与天国之城是鲜明对立的。而在现代世界中，这种对立则变成了平庸与充实——彼岸不再支配此岸。自从我们沦为日历和工资的臣仆，生活就变得平淡无奇：我们的存在被分割成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以及一张张工资单组成的单调往复的循环。

我在此复述已探讨过的观点，见L' Euphorie perpétuelle, Grasset, 2000。

平庸是贯穿所有时代的特质，但现代性与超越性的断裂，却将平凡如森然白骨般彻底显露无遗。昔日的世界充满方向感：生命虽短暂，却以灵魂的救赎为使命，以期赎回原罪。死亡并非终点，而是一扇通往未知之地的门扉——门后或是令人生畏的地狱，抑或是至福的天堂。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幸福的追求逐渐取代了对永恒的焦虑。那些曾被基督教道德家——如博须埃（Bossuet）和帕斯卡——所谴责的短暂享乐，随着医学和农业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而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而当法国大革命使人类取代上帝成为法律的基石后，日常生活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生活的意义不再由外力预先决定，而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创造与选择。由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创新的自由：生命能否有所进展，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④它既可以即兴创造，也可能陷入无尽的重复，局限于单调无休的循环。有时，日复一日的相似让人觉得仿佛生活开始“结巴”，这便是平庸的起源——一种停滞不前的时代病，其特征就如同坏了的唱片般无止境地重复。这种重复并非没有代价，它以沉重的情感税向我们索取：既让人心生厌倦，又令人精疲力竭。生活越是空洞单调，反而越能耗尽我们的精力。这正是这一现象的悖谬所在：它以自身的虚无不断吞噬我们的活力与生命力。事物越是重复，始终如一，它们带来的压迫感就越强。每一天都像是前一天的翻版，也是下一天的预演——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压力”：一种由无数琐碎烦恼和细微不安堆积而成的微观消耗战。正如萨特（Sartre）在《恶心》（*La Nausée*）中所写：“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发生。场景更迭，人来人往，仅此而已。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始。日子只是一天天地叠加，无缘无故，冗长而单调，仿佛一场无尽的累积。”

Pascal Bruckner, *La Tentation de l'innocence*, Grasset, 1995, p. 42; Alain Erhenberg, *La Fatigue d'être soi*, Odile Jacob, 1998.

这种重复性催生一种极具现代特色的疲惫感，它既无壮丽之处，也非源自非凡的壮举或重大事件，而是来自同一情境的无休止的轮回。如果说规律性是成就高效工作与长远规划的基础，它却也是一片令人迷失的浓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因无所作为而精疲力竭，承受着一种伪装为平静的隐性暴力。生活的“和平化”是一场无穷尽的战斗：琐碎的烦恼、微小的焦虑、轻微的冲突。尽管看似微不足道，但这一点点的累积，依然足以让人不堪重负。再加上，必须以自由与独立的个体身份行事所带来的“做自己”的疲惫感，^①无形中加剧了这种负担。即便是最平凡的生活，也显得过于纷扰。它一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因其单调乏味而令人倍感失望。令人厌倦的并不只是琐碎本身，而是其内在消耗人的力量。日常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一切置于中性状态，抹去所有的对比，将爱情、愤怒、激情与希望统统淹没在一种无差别的迷雾之中。自19世纪起，一种持续的哀叹便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回荡：那是一种对循环往复生活的抱怨，这种生活既单调又艰难，既让人昏昏欲睡，又令人筋疲力尽。正是这种现象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框架。缺乏标志性事件的生活并非中立的存在：时间的流逝本身——即便只是日复一日、分秒推移的平凡过程——也向我们收取代价，悄无声息地耗尽我们的精力。活着从来不是无偿的。即使无所作为，也依然充满潜在的紧张与隐匿的侵蚀性力量。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曾根据这幅画——《窗边的女人》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两个情人约定在一个房间见面，但二人各怀恨意，欲置对方于死地。（Philippe Rey, *Points Seuil*, 2020.）

这种缓慢的侵蚀，这场针对我们神经系统的隐秘战争，我们或许试图将其拔高为一场悲剧。然而，它并未构成任何宿命，仅仅是一连串无人问津的琐碎事件。而由此引发的那种抽象的疲惫感，其性质尤为独特——它并非源于过度活跃，而是扎根于一成不变的日常。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这种“什么都没有”却几乎等同于一种侵袭，它耗费的能量竟不亚于一场扣人心弦的冒险。人们常说，世界变化得太快，而数字化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本应简化最基本的服务，然而却让一切变得更加烦琐，最终的结果却与以往毫无二致。但更关键的是，当这个世界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加速也就因此失去了意义。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中红皇后对爱丽丝所说：我们拼命奔跑，却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惰性带来了不可逆的损害，逐渐侵蚀我们的情绪与精力。“只有我才会遇上这样的事”，正如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笔下那个一无所遇的人所感叹的。日常生活缺乏虚构故事的吸引力：它没有悬念。同样的事件以令人畏惧的可预测性一再重复，一切陷入无

尽的循环。当被问到“有什么新鲜事？”时，回答总是千篇一律：“没什么特别的。”某些事物似乎在不断重演，却从未真正开启。这种情境在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画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他将城市风景描绘成一种静止的悬浮场景——窗前的女子凝视街道，仿佛在等待某种不可言说的事物降临；咖啡馆窗后的几个无名之辈，身形微微佝偻，面露绝望，似乎在期盼一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改变。

倦怠与过劳，正是尼采（Nietzsche）对现代生活的精准概括。我们不断地与无形的幽灵作战，那些“死寂的时刻”成了挥之不去的敌人。在这场无声的抗争中，我们沦为平凡生活的囚徒：仅仅维持日常运转的最低标准，就已经耗尽了所有能量。我们忍受着注意力分散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却未能在真正的精神舒展中找到片刻安慰。所谓“日常”，不过是命运以最低的姿态缓慢推进，却始终未能超越自身的局限。被包装为情绪管理手段的“佛系哲学”，在无数人生导师的推销下风靡一时。它推崇禅修、冥想与放下执念，试图为我们单调的生活提供一种虚幻的精神支撑。而那些自诩“解脱者”与“内心平和者”则以从容安然的姿态示人，成为平静的象征。为何不呢？然而，他们不过是进一步放慢了这本已过于迟滞的步伐。我们真正需要的，绝非用更多的平静来对抗压力，而是一场真实的变革，一次超越自我的跃迁。单纯的生存焦虑，这种毫无张力的紧张感，催生出人们对镇静剂与放松疗法的无尽需求。放松已然成为低噪声生活的解药，而即便是生活中的小小波动，对亲身经历者而言，依然显得过于喧嚣。时间的加速带来一种虚假的充实感，但这种旋风般的节奏最终产出的却是虚无。无数的外界干扰甚至无法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撕开哪怕一道缝隙。当代人普遍感到一种矛盾：即便生活麻木乏味，他们却仍感到自己被一场狂风骤雨般的力量裹挟。他们迫切渴望停下脚步，在单调无趣的日子面前筑起一道安宁的屏障。处方药、心理疗法与精神药物，渐渐取代了对激烈活动或深刻情感体验的追求。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智慧的启迪，而是一种温柔的疯狂；不是精神的抚慰，而是一场彻底的沉醉。封控期间，这一矛盾变得更加显而易见：我们被强行推入一种疲惫不堪的日常生活之中，“无所事事”的强制状态反而激发出一种隐隐的不安。正如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言：“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可预见性和重复之上的单调实践。”然而，这种重复既使我们涣散，又令我们麻木，最终化为一种推动一切滑向混乱的熵力。

过去，宗教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死后是否仍有生命？而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被完全颠倒：在死亡之前，是否有真正的生活？我们是否爱得足够深切，付出得足够真诚，分享得足够慷慨？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将生活视为一场耐力赛，试图在漫长岁月中避开生活的冲击，而在于建立深刻的联结，体验炽烈的情感，并投入真实的承诺。当生活退缩为一种封闭的状态，仅限于躲在壳中、沉溺于电子游戏、追剧，或屈从于冲动消费时，它是否还具备任何意义？无论是试图放慢时

间的脚步，还是加速前行；无论是选择自我保护，还是直面未知风险，人类的内心都渴望某种震撼性的体验，需要触碰一种如恩典般的启示。若想感受到变革的力量，必须首先打破日复一日的沉闷，去体验新事物所带来的深刻冲击，而这种冲击是隐居式生活永远无法给予的。

5 手机的包法利情结

如果说波德莱尔（Baudelaire）认为悔恨是无法抹去的罪行与过错，那么平庸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无能为力——既无法创造新事物，也无法在一成不变的时间洪流中打开缺口。列维纳斯在论及奥勃洛莫夫时，不是曾写到“懒惰是一种无法开始的状态”吗？奥勃洛莫夫本人也坦言，他懒得去生活。对他而言，起床本身便需要一种英雄般的精神：迎接新的一天的勇气，掀开被子的勇气，将双脚踏上地板的勇气，以及直面这个时代的勇气。而这一切，他无一具备。对于那些甘愿随波逐流，让时间从清晨滑向午后，又从午后溜到黄昏的人而言，日常琐碎的世界并不缺乏诱惑。这是一种麻痹感官的愉悦，置身其中，人们几乎全然处于自动运行的模式。这正是2020年至2022年间，数十亿地球人所共同经历的体验——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令人不安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它却是令人沉醉的。

Emmanuel Levinas, *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 Vrin, 1981, p. 38.

“懒惰”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普通意义上的懒惰，即对劳动的厌恶；其二则是更具形而上意义的懒惰，是面对“存在之重”（l'existence comme charge）时的无力感（列维纳斯语^⑤）。前者是拒绝为了生存而耗尽生命，后者则是一种彻底的放弃，一种对存在的根本性无能。既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将自己蜷缩于茧中便成为逃避感知这种重负的方式，但代价可能是消解一切欲望与渴求。这正是“关塔那摩式居家隔离”的内在矛盾：我们珍爱这些居所带来的庇护，直到有一天，它们将我们反噬，如章鱼般用触手将我们缠绕至窒息。沉睡与持续的休憩最终也可能蜕变为另一种压迫。而20世纪末问世的手机则堪称破解这一矛盾的天才发明。它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保持联系，却也因此让未能及时回复信息变得难以忍受。这台小巧设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隐去了自己所提供的一切。手机将整个世界浓缩打包，带回了家：信息、新闻、音乐、电影。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进步。然而，因为一切尽在手掌中，它也让世界变得多余。世界来到了我面前，我无须再迈向它。手机甚至让世界显得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潜能永远超越我所能实际经历的一切。作为一个全球性公共空间，手机让我们可以跨越大陆对话，而无须亲身前往。我们每天翻看手机数百次，仿佛在查阅一本电子版的圣经或祈祷书。但我们并非为寻求建议或汲取道德教诲，而是因为它赋予了我们一种动态的存在感——一种无须亲身体会即可感知的存在感。人们不断地在口袋里、手掌中反复触碰手机，只为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是否还与整个世界保持连接。

我的智能手机里总有事情在发生：有趣的新闻、意外的惊喜、好玩的游戏，以及琳琅满目的应用程序。似乎只有它，才能为平淡无奇的日子注入一丝新鲜活力。与其说它是生活的调味品，不如说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娱乐狂欢。这只叮当作响的小动物，俨然成了一条电子套索，每当它轻微振动，便将我召唤到它身边，要我随时随地有所响应。将一切寄托于这个迷你宝盒，连同我们的欲望和激情，无异于为了它而放弃生活。本该是简单工具的它，摇身一变却成了我们的主人。尽管我们尝试通过各种戒断疗法摆脱它的掌控——整天不开机、开会时将它丢进篮子，甚至刻意忘记它的存在——但每次“重逢”时的兴奋却如同恋爱般让人难以自拔。我们期待它能实现一种包法利式的万能幻想、一种狂热的希望，紧随而至的却是深不见底的失望。我们渴望它带来，或至少预告某个翻天覆地的事件——那种无论爱人身处何方，都能即时连接的便利——却也让等待与未获回应变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他（她）不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们将责任归咎于小小技术之神的捉弄：可能是没电了，可能是信号不好，甚至可能是手机被偷了。然而，真相往往更为残酷：对方根本不想与你说话。

Neil Postman, *Se distraire à en mourir*, fayard, 1985, 法语版；

Bruno Patino, *La Civilisation du poisson rouge*, Grasset, 2019。

手机啊，我的手机，请你告诉我，有一件奇妙的故事即将发生。震撼我吧，给我带来惊喜吧——这正是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日夜不休的低声祈求。不论是在地铁、公交车上，还是在火车、飞机上，每一次微微的振动都成为召唤，让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向这台设备。然而，即便是最先进的手机，也只能提供它本来所具备的功能，即一个精密的通信系统，却无法创造朋友、恋人或未来。令人唏嘘的是，在列车、公交车或飞机上，有如此多的人沉迷于玩游戏、追剧，而非与他人交谈、欣赏窗外的风景，或是翻开一本书，沉浸其中，徜徉在往昔的记忆里，抑或是开阔新的视野。屏幕因信息洪流的过剩而变得空洞虚无。而手机成瘾的根源在于，它让事件的体验不再需要亲身经历，而是以代理的方式进行。当生活毫无波澜时，手机至少能构建一种虚幻的现实感。然而，它永远无法给予我们现实的质感与深度。身处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手机提供的是无风险的刺激，帮助我们忍受空虚。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不过是一场幻觉。如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手机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身体器官，也许不久的将来，它将像义肢一样，被植入我们的耳朵、眼睛。数字时代标志着分心的全面胜利与专注的彻底溃败。^⑤我们早已失去自控力，每时每刻都在渴求新的满足感。而这种执迷的行为，无非折射出体验的匮乏。试问，有多少人在与朋友或伴侣共进晚餐或交谈时，能心无旁骛、安安静静地专注于当下，而不是频频地查看手机？每当一条信息弹出，似乎都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立即回复，否则后果自负。手机让我们与一切割裂，甚至包括与自我的联系，最终陷入对下一条短信、下一个电话的狂热追逐之中。这件原本旨在促进人与人沟通的工具，如今却阻碍了我们与亲近之人进行真正的对话，只

剩下了零星或断续的交流。在公交、火车上或商店里，这种交流的“碰撞”从未间断——那些毫不避讳地高声交谈的“闯入者”，强行将你拖入他们的私密对话之中。新时代的“义肢人”无时无刻不在掏出手机，甚至欢愉之时也不例外，仿佛置身于新闻前线的战士，唯恐错过任何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一则通知。他们便是“错失恐惧”族（FOMO，即英语fear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在手机的不断召唤下，人们沉溺于最新的动态、最新的通知。这种信息的雪崩与爆炸，远比任何潜在交流对象的身份更能激发兴奋感。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戒断中心”将逐渐普及。客户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享受这种独特的服务：手机和电脑被没收，连续数天生活在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房间，与外界唯一的联系仅靠一部发出叮当声响的老式座机。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翻阅传统的纸质报纸，或静静地阅读老式的硬皮书。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面交流，甚至像从前那样，重新习惯彼此的触碰。为了在当下应对时间的流逝，他们将接受一场重返旧时光的疗程。

6 洞室、修室与居室

Platon, *La République*, Livre VII, 516 b-517 b, p. 273 sqq,
Garnier-ammarrion.

柏拉图（Platon）在他的“洞穴寓言”（le mythe de la caverne）中，勾勒了一个深植于西方意识中的永恒隐喻。一群人被锁链囚禁在洞穴深处，面朝墙壁，无法转头。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身后篝火投射的光影，以及路人经过时在墙上留下的投影。这些囚徒误以为这些影子就是全部的真实，甚至认为它们比光源本身更加确凿。^②如果强迫其中一人走出洞穴，让他直面光明、接触真理，他的双眼就会被强烈的光线刺痛，甚至暂时失明。他会感到恐惧与不适，渴望逃回洞穴，回到那令人安心的昏暗之中。唯有最勇敢、最无畏的人，才有可能挣脱洞穴的束缚，抛却虚幻，转而凝视星空、太阳以及宇宙的真实光辉。然而，真正见识过光明的人，再也无法适应洞穴的黑暗。他们很难与那些仍然被蒙蔽的囚徒交流自己的发现，也无法重新认同囚徒们的谬误。对向格劳孔（Glaucou）讲述这一寓言的苏格拉底（Socrates）而言，洞穴象征着充满谬误的感官世界，而洞穴之外的广阔天空则象征着充满真善美的理性世界。从神圣的沉思转向人类的凡俗事物，对那些已然领悟真理的人而言，是一件痛苦且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难以与仍然深陷虚假之中的粗鄙之人对话。苏格拉底由此得出结论：洞穴中的囚徒需要通过教育逐步提升自己的认知，才能最终达到对纯粹理念的领悟与思考。这一教育过程，是从虚幻迈向真实、从蒙昧步入光明的必经之路。那些已然洞悉真理与美德的少数精英肩负着返回洞穴的责任，与其他囚徒共同生活，并引导他们认识美德。这些被选中的人，正是哲学家。他们怀揣使命，回到那“共同的居所”（commune demeure），启发并引领他们的同胞，走向更高的认知与德行。人类的生活始终游走于光明与黑暗之间，唯有哲学能够将人类引向光明。而这光明，不仅是存在的真正居所，更是通往真理与自由的唯一道路。

引自Bernard Edelman, *La Maison de Kant*, payot, 1984, pp. 25-26,
Christian Bourgois, 1995再版。

此寓言不仅奠定了欧洲哲学及其唯心主义的基础，更因其丰富的象征意义启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然而，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寓言的内涵似乎已然反转。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洞穴不再仅仅是束缚自由的象征，而是被改造成了配备现代舒适设施的避风港。如今，封闭的空间不再代表阴暗，相反，它被视为庇护与健康的象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洞穴”才是真正的安全领域，而外部世界以及通过屏幕源源不断涌现的影像，却成为暴力与野蛮的代名词。自18世纪以来，欧洲的私人生活逐渐成为现代人构建自我、享受亲情与家庭、规划个人命运的神圣领

域。人们不再将可朽的现象世界与永恒的本质世界置于对立面，而是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视为两极。每个时代对这两者之间的流转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这种循环往复始终是人类生活的核心。要在这个世界中立足，人类需要一个能够庇护、休憩并保护自身的居所。或许正因为伊曼努尔·康德（Emmanuel Kant）生活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他才以极具戏剧性的语言指出：“家与居所是抵御虚无、黑夜以及那晦暗起源的唯一屏障；它的围墙之内，凝聚了人类数世纪以来耐心积累的一切成就。……人类的自由在稳定与封闭中绽放，而非在开放与无限中繁盛。居家意味着接纳一种舒缓的生活节奏，以及沉思冥想所带来的宁静与喜悦。……人的身份由居所塑造。这也正是为什么革命者——那些无家可归、无信仰、无法律之人——会成为人类对漂泊不定的深切焦虑的凝聚象征。”^①

Chateaubriand, *Vie de Rancé*, édition présentée par André Berne Joffroy, Folio Gallimard, 1986。这本书的悖论在于：它在作者去世后才被重新发现，原作故事被进行了极大的自由发挥，以反讽的方式体现了对修道生活的最严厉批判和对世俗生活的最热情赞美。

原文作bouddhisme teravala，有误。——译注

Eric Sutter, *Code et langage des sonneries de cloches en Occident*, SFC, 2006.

柏拉图仿佛以某种方式穿越了数个世纪，为我们勾勒出现代居家生活的轮廓：洞穴再加之电力与社交网络。在古希腊与21世纪之间，另一种人类形象悄然登场，那便是早期的基督教隐修士。他们选择远离世俗，隐居于修室之中，正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笔下的兰塞修士（l'abbé Rancé），自愿幽闭于特拉普修道院。^②这些修道士究竟在追寻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在现世中见证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那还能是什么？修道生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上座部佛教

（bouddhisme theravāda^③），然而在基督教，尤其是在西方与中东地区，它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圣本笃（Saint Benoît）于公元6世纪制定的修道院规则，对时间进行了严密的划分，设立了长时间的沉思与祈祷时段。这种时间的管理方式，预示了一种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俗时间体验。修道士与修女放弃了原有的世俗身份，接受了一个新名字，而更为独特的是，他们与我们一样，受制于一种被称为“日常”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既可能引领他们走向上帝，也可能让他们迷失于无望之中。可以说，正是在修道院与修女院的幽静环境中，西方逐渐掌握了对时间的精细管理。修道生活的核心追求并非仅限于清贫，还有一种对规律性生活的全面依赖：将自己交托给上帝，便是将自己交托给一套严密的规则，这种规则帮助修道士摆脱对日程安排的焦虑。正如尼古拉·迪亚特（Nicolas Diat）在《修道士的完美生活》（*La vie rêvée des moines*）中所言，修道士生活的意义在于，在日常事务的循环中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祈祷、沉默、言语与劳动的协调交替。对主的忠诚，首先体现在对固定时间的严格遵守上，因为这些

时间正是与主相遇的神圣时刻。钟的首要功能是通过特定的节奏与独特的语言报时实现的，无论是午夜还是正午，无论是欢庆的钟鸣，还是丧钟低回、警报长鸣。钟声如同一位音乐信使，既传递信息，又赋予时间以韵律。它标志着工作的开始与间歇的休憩，甚至在风雨飘摇时，它还为迷途的旅人指引方向，带来一丝希望与慰藉。^⑤远离尘世的生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凡人暂时隐退，将反思与冥想视为短暂的中场休止；另一种是修道士，他们将修道院视为一生的归宿，日常生活仅因田间劳作、探视病患或为临终者送别的使命而短暂中断。

见Tzvetan Todorov, op. cit., p. 29。

Saint Jean Cassien, *Les Institutions cénobitiques*, 420 après J.-C., éditions du cerf, 1965, 见Madeleine Bouchez, *L'Ennui, de Sénèque à Moravia*, Bordas, 1973, p. 34。

新教徒用工作取代祈祷，将其升华为一种近乎宗教的行为，并指责修道士是寄生于信徒之上的懒惰之徒，沉溺于奢靡与放纵。伊拉斯谟（Érasme）曾说，上帝无处不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本身就是一座修道院，“所有人都是同一修会的教士与僧侣”。^⑥从某种意义上说，修道士是一种“过劳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冰冷无情的时间表驱使的人。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当虔诚逐渐消退时，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时间的流逝”（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语，Vladimir Jankélévitch），承受日常时间无情而沉重的压迫。只要信仰仍然充盈心间，修道士便能赋予每个时刻以独特的意义，将其献给上帝的荣耀与灵魂的救赎。然而，一种可怕的毒素有时会悄然渗入修道士的内心，这便是“懈怠”（源自希腊语 *akedia*，意为冷漠或忧伤）。这种令人畏惧的折磨使苦行者与上帝渐行渐远，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忧郁与沮丧之中——誓言将生命奉献于祈祷与崇拜的人，却因对祈祷本身的厌倦而骤然对灵魂救赎失去了兴趣。这种痛苦极其深重，甚至连教会也显得束手无策。“一旦这种情绪占据了修道士的心灵，他便会对自己的居所心生厌恶，对修室满怀嫌弃，同时对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其他修道士怀有轻视之意，甚至对那些远在他处的修道士也嗤之以鼻，视他们为懒惰或不够虔诚。这种情绪让他变得懒散且毫无斗志，无法完成修室内的任何事务，也无法静下心来阅读。……最终，他会认定，若继续留在这里，他的灵魂将无法得救；他必须尽快离开，舍弃这间修室，否则他觉得自己会与之同归于尽。”^⑦在那些本应充满虔诚与静思的修道院中，懈怠悄然引入了一种微妙的不安，如同一层阴郁的迷雾，暗中渗透并腐蚀了原本宁静而光明的氛围。这股迷雾侵蚀着修道士的内心，消解了他们的热忱与活力，将对永恒的追寻拖曳回短暂而纷乱的世俗冲击之中。

Pier Vittorio Aureli, *Less is enough*, Strelka Press, 2013.

因此，修道士必须昼夜不停地忙碌，通过对其精神空间的精细划分，并以各种琐碎甚至徒劳无功的任务填满他的时间，从而防止恶魔乘虚而入，加速其松懈与堕落。苦行者、修道士与隐士，往往是平庸最早的受害者。这种平庸，与现代生活颇为相似，表现为两种看似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深沉的倦怠感，另一方面却被忙乱的事务与对仪式的狂热追求填满，其中包括弥撒、赞美诗与跪拜等无尽的宗教礼拜。修道士的生活被简化为一场无止境地向“缺席者”——上帝的祈祷，他们不得不面对主的沉默，因此更容易陷入无所事事的困境，被漫长而单调的日常时光吞没。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已然空虚，因为那曾维系他们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已悄然断裂。值得注意的是，修道院的苦行主义似乎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标语。例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曾拍摄过一张著名的照片：在加州的家中，他手握茶杯，坐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宽敞房间里，只有一盏灯和一台唱机点缀其间，展现了一种极简主义的炫耀。^⑫在他的时代，苹果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被要求遵守一套以简约为核心的严格纪律，甚至连服装都整齐划一。修道院将规矩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演变成了工厂、办公室、学校、医院乃至监狱的原型，成为现代机构与企业的模板。

Saint Augustin, *Les Confessions*, Livre X-5-7, Louis de Mondalon译自拉丁文, Seuil, p. 253 sqq.

原文作Maître Eckhard, 有误。——译注

内在性究竟是什么？不过是一种隐喻。一个试图深入自我以寻找独特性的个体，最终只会发现一个空间的隐喻。在基督教传统中，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首次将私人空间描述为“他性占据之地”：在人类尘世的存在中，只有黑暗与模糊，唯有神圣之力才能开启通往这一领域的钥匙。“自我”并非真正属于自己，因为在最深层的存在之中，潜藏着绝对的他者——那至高无上的超越性。为了迎接这一神圣的他者，我们必须搁置尘世的一切，为其腾出空间。因此，追求内在性便是迈向与上帝，即那位“比我自身更深入于我”^⑬的心灵之神相遇的旅程。奥古斯丁认为，若自我不向至高无上的主献身，便不过是幻象罢了。这一思想随后得到了埃克哈特大师（Maître Eckhart^⑭）、帕斯卡和圣方济各·沙雷氏（François de Sales）等人的继承与深化。然而，约1000年后，卢梭（Rousseau）对这一观念进行了修正。他提出：“没有什么比我自己更与我不相同。”卢梭并未将这种内在分裂归因于上帝的伟大，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的恶意——尤其是诽谤者的攻击和社会的不公。从奥古斯丁提出的内在性概念——将其视为自我与自我之间的最大距离，到卢梭将“亲密性”解读为他者对自我的排斥，1300多年的时光已然流逝。在此期间，欧洲经历了深刻的世俗化进程，尘世生活被重新评估并得到正名。然而，这一他者无论是在奥古斯丁那里的圣主、心灵深处的神圣居所，还是在卢梭眼中恶意的人类，内在世界始终未能逃离他者的占据。此后，心理学、弗洛伊德学派以及文学领域，纷纷以各种方式探讨“精神

暗室”，它既可能是一片空无，也可能被家庭记忆挤得满满的。这个隐秘空间之所以难以解读，是因为我们丢失了破解其奥秘的钥匙。宣称拥有丰富的内在生活，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只有身陷古拉格或纳粹集中营的囚犯，才能真正展现这种能力——在恐怖与严寒中背诵整首诗歌，与同伴分享。反思、祈祷、追忆，这些行为始终意味着一种与遥远他者的对话。若无这样的他者，心灵密室中只会回荡虚无的空响。

居所因此成为冥想与反思的根本之所。天与地、上与下的对立，被替换为“居所”与“他者”之间的分界。没有这个根本的小小家园——一个房间、一套公寓或一所房屋——便无法真正着手影响世界。然而，逃避世界与暂时将其搁置一旁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或屋子里，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部世界，而是暂时搁置它，以便更好地重返其中。然而，当居所蜕变成牢笼时，它便扼杀了与现实之间那种充满激情的直接交锋。此时，居所不再是栖身之所，而是一个孤立的碉堡，甚至成为与世隔绝的防御工事。

7 家的魅力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chambres*, seuil, 2009, p. 27 sqq.

“隐私”这一概念同样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发明。它首次出现在18世纪末，并扎根于崛起中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之中，同时伴随着婚姻中爱情观念的兴起而逐渐成形。在此之前，欧洲的居住模式长期以社区化为主，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乡村还是手工艺人聚集区，皆是如此。彼时，个体作为一种可脱离他人视线而独立存在的观念毫无意义（这种现象在印度等传统社会中至今仍然存在，那里的人们依然是种姓、家庭或村庄的“所属物”）。在最贫困的住所中，没有任何夫妻隔间，父母与孩子通常同室而住，有时甚至同榻而眠。即便是贵族，甚至是法国国王，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具备多少隐私可言。所有的日常行为，包括最“私密”的生理活动，几乎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例如，那把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著名“便椅”（chaise percée），它既是权威身份的象征，又承载着对宾客的某种轻蔑。[据圣西蒙（Saint Simon）一段著名的记述，军事家旺多姆公爵每天清晨起床后，便端坐在这张“毫无尊贵可言的宝座”上，堂而皇之地在如厕之时接见亲友与朝臣。装满的便盆就那样从众人面前端走，毫不避讳。] 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指出，路易十四的卧室可以被视为整个宇宙的缩影，不仅是君权与国家的象征性脉搏，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每日晨起与夜寝之时，朝臣们便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床前，向国王致敬，并依照严格的礼仪与他交谈。即便王榻空无一人，他们依然要恭敬地鞠躬致意，仿佛是在教堂里向祭坛行礼。[即便是在当代，克莱芒·罗塞（Clément Rosset）曾提到，拉康（Lacan）的崇拜者们也会不远千里地赶往乌尔姆街的教室，即便大师本人不在场，他们也要向他的精神表达敬意。] 此外，还有一队通常由男性组成的仆从，专门负责打理国王的睡袍、衣橱、紧身裤袜和鞋履等一切物品，这些事务皆由“首席侍从”进行监督。“卧室”（chambre à coucher）这一词汇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君主被视为属于其仆从与臣民的“财产”，唯有与正式配偶或情妇共处的短暂时光才得以脱离众人视线。因为国王的身体既是“神秘”与“物理”的交汇体，象征着血统的延续，也体现着肉身的短暂存在。正如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曾精辟地指出：“国王唯一缺乏的，便是私生活的温馨。”

同上书，p. 59。

这种观念的雏形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文明化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语，Norbert Elias）的推进逐步成形。而文明最初的表现形式正是“羞耻心”的觉醒：不在人前随地吐痰、不在公开场合排泄、不在众目睽睽之下

行房，以及将那些昔日公开进行的行为逐渐藏匿于私密的空间。然而，随着个体崇拜逐渐渗透社会，这种对隐私的需求在整个民族中日渐隐去，而集体约束则开始被视为一种压迫。现代自由所追求的，是挣脱群体的束缚、摆脱社会地位的限制、打破被出身决定的宿命。为了逃离公用空间压抑的氛围——这种氛围至今仍在寄宿学校、军营或山区避难所中存在——人们逐步为夫妻设计出用帘子围成的密闭床铺。20世纪后半叶，皮埃尔-雅克兹·埃利亚斯（Pierre Jakez Elias）将这种设计形容为“睡眠保险箱”（coffres-forts à sommeil）^⑤。一种相较于集体宿舍更具私密感的家居氛围逐渐显现。集体宿舍不仅变成了贫困者的宿命，而且还常常成为各种虐待、性侵和乱伦的温床。最贫困的人通常直接睡在地上，或躺在爬满害虫的草垫上，床垫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奢望。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高床，有时甚至需要借助小凳子才能爬上去；而最富有的人则享有配备华丽床帐的高床。卧室，尤其是夫妻卧室，作为休憩与亲密的空间，逐渐被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家庭之外的陌生人若想踏入卧室，不仅需要小心翼翼，还必须得到明确的允许，否则不得擅入。

“流泪谷”（vallée de larmes）一词出自《圣经·诗篇》第84章，第5、6节。意为干旱无雨的荒谷，形容令人哀哭之地。——译注

18世纪末，“舒适”这一概念率先在英国萌芽。彼时，贵族的城堡虽华丽却阴冷，而农民的茅屋则简陋且污秽。对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这位以痛苦与快乐为核心的思想奠基者，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家、私人财产权的坚决捍卫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而言，舒适与安逸应凌驾于贵族生活的粗粝与浮华之上。人们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宽敞通风的房间、舒适的座椅与床铺、干净的盥洗室，以及高效的取暖设备。通过物质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建筑和装饰的精巧设计，人类立志要把这个世界从“流泪谷”^⑥打造成“玫瑰谷”。生活条件的改善彰显了一种新的愿景：将幸福塑造成人类新的栖居地，并使之成为自然的生活环境，一种取代天国彼岸的美妙的世俗家园。享乐不再被视为需要避之不及的致命罪恶，而是人性体现的一种馈赠，受到了友善的接纳。这种理念让享乐与虔敬得以和谐共存。对身体的重新定义，意味着为其提供一个得体的栖息之所。身体不再是灵魂短暂而可弃的外壳，而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伙伴和唯一的舟楫，需要通过卫生与医学的规范得到妥善照料与呵护。为了更好地迎合身体的需求，人们发明了软垫、衬垫和织物，精心设计出符合人体曲线的家具。一切能够提升坐卧舒适感的设计都被优先考虑。室内空间被悉心打造，成为一个超越外界生活体验的理想之地。

“驴皮”（la Peau de chagrin）出自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书中主人公瓦朗坦得到一张驴皮，她能为主人实现任何愿望，但愿望一经实现，驴皮就会立刻缩小，主人的寿命也随之缩短。——译注

Une chambre à soi, Clara Malraux译, 10/18。另有Marie Darrieusecq译本, 题为Un lieu à soi, Folio Gallimard。

在成为封闭的私人空间之前, 房间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保护与庇护。例如, 难民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所, 他们只能依赖他人的收容和公共慈善, 进而也不得不屈从于东道主的意愿。即便在现代城市中, 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哪怕只是一个狭小的房间, 甚至是一间储物室——也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伦敦、纽约或巴黎这些房价高企的城市, 居住空间正如“驴皮”^①般不断收缩, 住房问题早已演变为一项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自19世纪起, 普及住房便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用以防止工人阶级滑向酗酒的深渊, 并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卫生与健康保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 被咆哮着责令早早上床的孩子, 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成年人”相处的机会; 而当他们成长为青少年后, 就会强烈要求尊重他们的隐私, 捍卫自己的卧室如同守护一座堡垒。“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 在他们看来, 这片空间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任何未经许可的进入都等同于一种侵犯。这片私密空间为他们提供了成长的避风港, 是他们沉思、规划人生、制订计划、隐藏恋情的地方。对艺术家和作家而言, 房间不仅是一个栖身之所, 更是灵感的温床与创作的天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便是典型例证: 他长年躺在床上写作, 通宵达旦地挥笔疾书, 周围的墙壁贴满软垫, 以隔绝外界的喧闹。然而, 房间不仅是创作的避风港, 亦是幽静的乐园。在紧闭的门后, 情人们深情缠绵, 夫妻们在婚床上享受片刻的宁静; 这里既是生命诞生与终结之地, 也是病人卧床疗养的场所, 更是老人与残疾人被迫“禁足”的空间, 甚至是囚犯服刑的象征。拥有一间房间, 一直以来都是女性主义的重要议题。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其著名的宣言性作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写道: “女性若想创作小说, 就必须拥有金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②在这本犀利且充满讽刺的文集中, 伍尔夫指出, 女性若想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必须首先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这一观点早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中就已有体现]。

蒙田(Montaigne)是第一个主张拥有一个独立空间以便沉思和工作的思想家: “我们需要保留一间属于自己的里间, 完全独立、完全自由, 在此打造真正的隐居与独处之所。”从古至今, 男性一直是外部世界的主宰者, 是征服者; 而女性则被束缚于家庭琐事和子女教育中, 至今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仍是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举在于, 她用响亮如口号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将这一封闭之所转变为自由之地: 一间专属于自己的、与婚房相邻的房间, 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 是女性不再依附于丈夫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独立的天地, 丈夫和孩子除非获得特别许可, 都不得擅入。在那里, 女作家或女艺术家得以闭门创作, 随后再将自己的光芒散射向更广阔的世界。象牙塔对于那些渴望独处以进行创造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孤独, 而非外界强加的陪伴。无论是作家、

艺术家，还是手工艺人，他们的工作本质上都意味着一种自愿的隐居，专注于创作与沉思。他们时而也会因作品而赢得公众的瞩目，这是对他们隐居状态的回应与回报。

8 束缚生活的苦与乐

Charles Baudelaire, *La Chambre double*,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1869.

Michelle Perrot, *op. cit.*, pp. 374-375.

居所因而蕴藏着一种安宁的幸福：当防护措施普遍实行，社交距离成为常态时，家便成了柔情蜜意的避风港，是双手相扣、情感恣意流淌的温馨之所。然而，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房间，它也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纱幔轻扬的东方宫殿，在那里，“灵魂沐浴于慵懒的梦境”；另一面却是破败不堪的出租屋，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腐败交织的气息”，^②执达员（huissier）催缴房租，否则便面临被驱逐的命运。房间的命运亦有两种：要么是迈向独立生活的序章，要么是收缩成令人窒息的栖身之所。对于一个年轻人，无论男女，离开家搬到单身公寓或合租房，都象征着逐步迈向自由与独立的开端。人们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完全隔离于家庭的小天地——在这里能够成为自己领地的主人。拥有一把钥匙、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以及一个卫生间，即便需要与他人共享客厅和厨房，在20岁的年纪，这种生活也已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了。在这一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间中，人们可以享受家的宁静，凝视墙面上自我精神世界的映像，拥有自己的书架、电脑、海报、冰箱，以及装满衣物的衣柜，并可随心所欲地进出。家的引力在于，它让人得以安顿身心，整理物品，从而掌控当下，规划未来。然而，舒适与囚禁之间的界限却异常微妙。房间曾经也是囚禁之所——那些不顺从的妻子、姐妹，往往会被丈夫、兄弟或医生锁在其中。^③私人空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它有时也会反噬那些受益者。

Zad全称zone à défendre，译为保护区或抵抗区。是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在阻止开发项目时所采取的激进占领运动。Zad这个缩写是对从缓发展区或延迟发展区（zone d'aménagement décalé，ZAD）的变相模仿。后者指的是为保持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而暂时不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区域。——译注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cinquième promenade, Gf, 1964, pp. 95-96.

同上书，pp. 101-102。

居所的形式千姿百态：贝壳屋、代表森林浪漫生活的怀旧小木屋、茅屋、帐篷、冰屋、堡垒、地下室，甚至是村庄或是保卫区（Zad^④）。当然，还有防空洞、地下室、下水道或地铁网络，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欧美生存主义者的兴起，再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无论何种住所，它首先是一个几何空间，是内与外对话的场所。卢梭发现瑞士比尔湖（lac de Bièvre）的圣彼得岛（île de Saint-Pierre）是一个如“套盒”般的静谧天地，他在那里体验到“热爱自我限定之人的幸福”。在这片土地上，他得以逃离人类社会和那些“恶人”，幻想终生被禁锢于此，让这一“避难所化作永恒的牢笼”。^⑤卧于小舟之上，随波逐流，他尽情享受“自我与自我存在”的喜悦，那是一种完美的幸福，“让灵魂不留一丝空虚”。^⑥福楼拜（Flaubert）曾在书信中谈及作家的使命，那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献身：“必须关紧门窗，像刺猬般蜷缩起来。在寒冷的日子里，让壁炉的火焰熊熊燃烧，唤起内心深处那伟大的理念。”而巴什拉（Bachelard）则在《梦想的权利》（*Le Droit de rêver*）中，描绘了他理想中的水边住宅：“我还需要一扇小窗，因为窗户越小，这所房子的‘眼睛’就能看得越远，也越清晰。”如今，蛰居亦可如雷达般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号，只需敲击键盘，或让遥控器或智能手机在掌间翻飞。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线”（en ligne）——一个多么奇特的词语。曾几何时，罚抄写（faire des lignes）是学校的一种惩罚。而现在，它象征着通过代码与世界联通。在这私密的“公共空间”中，我们无须离家，便能独自与全世界对话。透过家中的屏幕，我们同时扮演着“外在世界”的演员与观众。亚里士多德（Aristote）曾将生活分为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而在今天，或许我们需要为当代创造一个新的类别：虚拟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公寓与住所转化为一个微观宇宙，它不仅吞噬了宏观世界，还让后者变得多余。这是一个遍地宝藏的洞穴。远离强风劲雨的侵袭，在这一温暖的洞穴中，人们接收从远方传来的信息，但那不再是理念之光，而是变幻莫测的冥暗投影。

Annie Ernaux, *Journal du dehors*, Gallimard, 1993.

搬进一间公寓，首先便是要留下自己的印记，赋予它独特的个性，将其从匿名的空壳中解放出来，抹除过去的痕迹。所有的房间都潜藏着某种“幽灵”，这是哥特小说早已揭示的秘密。我们需要为房间驱魔，才能真正使其成为属于自己的空间。即便是那些千篇一律、互相雷同的酒店房间，也难逃我们对归属感的深切渴望。每一个居住空间都会展现出一种氛围，它要么吸引人，要么令人却步。而正如纪德（Gide）在谈到蒙田时所言，我们最终的挑战是“挣脱这重重裹覆”。然而，对房间的征服有时也可能演变为一种诅咒。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女权主义口号：“我的身体属于我。”这句口号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若无人愿意靠近它、探索它，或与我分享、赞美它的美好，这种绝对的拥有感最终会变成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在回忆自己43岁那年在巴黎一家百货商店遭遇扒窃时提到：她隐隐被那个颇具流氓气质的年轻窃贼吸引，但同时又深感屈辱，因为“如此娴熟的动作、精湛的技艺、强烈的欲望，竟然只是为了我的手提袋，而不是我的身体”。^⑦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但若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访客、没有朋友，也没有孩子，那么墙壁映照

出的便只剩我的孤寂。庇护所最终蜕变为监狱，我在每个角落都撞见自己。这正是疫情的诅咒——它将我们囚禁于“内部”，尤其是那些被隔离的人和年长者。若“外部”不复存在，那么“内部”也就随之失去意义，化作一个毫无出口的封闭之地。世界的光辉与惊喜的美好，再也无法通过你来我往的流转来滋养我们的空间。空间的封闭，首先带来的便是思想的封闭。

Emanuele Coccia, *Philosophie de la maison*, rivages, 2021, p. 186.

多年前，美国大学校园，这个现代社会各种病态的温床，催生出了所谓的“气泡主义”（bullisme）。一些女性或少数群体成员认为自己需要待在专属的“安全空间”中，禁止外人入内。这些空间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扩展自我、宽广心胸，不如说是为了集中精力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形式的侵害。哪怕只是稍微提及往日的创伤，如奴隶制、剥削或性别歧视，都会在这些年轻而脆弱的心灵中引发极大的不安。于是，人们不再被鼓励与外界直接接触，而是被层层包裹，以避免一切可能的伤害。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为选举服务的社区主义中，其目的是将人们圈定在自己的族群、宗教或种族范围内，以避免他们受到其他文化习俗或行为方式的“冒犯”。欧洲一些市长倡导的“宁静城市”（villes apaisées）概念也流露出类似的倾向。这一理念可能会使我们的城市逐渐演变为死气沉沉的墓地或无菌化的空间。一座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必然要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房间与独屋就如同肺叶，唯有与外界连通时，才能扩展与循环。一旦门窗紧闭，肺叶便会逐渐萎缩，只能吸入陈腐的空气。这也可以解释“乌克兰灌木人”（les lioudi kouski）这一病态现象：他们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家中，即使炮火连天也拒绝离开。我们始终需要一种“半敞开式的形而上学”（加斯东·巴什拉语），它预示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充满活力的偶发性。生活始终是一种在门槛上的存在，即在开放与回归之间找到平衡。公寓与独屋唯有敞开通向邻里、街道或周围的乡野之路，才能真正成为自我的延伸。它们在这种连接中化作“边界”或“耳朵”，倾听并迎接未知的世界，为通向新命运开辟路径。埃马努埃莱·科恰

（Emanuele Coccia）提出的“世界房间”（chambre monde）乌托邦，或许不过是一种托词——即便再豪华的房子，也无法替代整个星球。简而言之，在这里，我们无法与他人相遇。②与之相对，诗人苏佩尔维埃尔（Jules Supervielle）在谈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时写道：“过多的空间比空间不足更令人窒息。”监狱不一定局限于封闭的墙内，广袤的草原或无垠的海洋同样能成为牢笼，那无尽延伸的“固定不变的地平线”（horizon immuable）亦可压迫人心。无限的空间与狭窄的牢房一样令人窒息。在俄罗斯，那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本身便是监牢。古拉格劳改营的压迫不仅源于狱卒的残酷，更源于那巨大到令人绝望的距离。

福楼拜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中的主人公之一。——译注

Gustave Flaubert, *Bouvard et Pécuchet*, Livre de poche, p. 43.
J.K. Huysmans, *En rade*, préface de Jean Borie, folio classique,
1984.

人们常说的“回归乡野”，自18世纪卢梭将自然视为疗愈文明创伤的解药以来，便成了一种文学上的陈词滥调。我们记得布瓦尔（Bouvard）^①在得到一小笔遗产后兴奋地喊道：“我们要归隐乡间！”^②随后，他和朋友便逐一考察了所有适合安居的省份，最终选择了诺曼底，成了一对既毫无经验又极其勤勉的乡绅。然而，这一被寄予道德上重塑“新人类”的希望田野，却无情地淘汰了最脆弱的人。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与“绿色天堂”的重逢同样充满矛盾。这更像是一种暂时的“退避”，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它是一种温和的替代，而非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行为。这种生活犹如身处“外部”的囚禁：人们逃离城市的喧闹，追求一份宁静的生活，随心打理出一个小花园，过上一段绿意盎然的假期，并将这里视为应对生活困境的避难所。然而，这个花园本身不过是一个“通风”的茧，它的围限性与其他空间并无二致。早在1880年，J.K. 于斯曼（J.K. Huysmans）就在小说《荒野》^③中击碎了田园度假的浪漫幻想：一对厌倦巴黎喧嚣的夫妇逃往布里的一座乡间城堡，投奔他们的农民亲戚。然而，现实中的乡村却充满阴郁：要么是连绵的阴雨，要么是恙螨的叮咬，而那些亲戚也不过是一群阴险狡诈的恶徒。如今，即便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公寓里，人们也能打造自己的“室内菜园”——客厅里种植的萝卜、豆角，阳台上开辟的果园，简而言之，就是袖珍版的田园生活。家宛如一个吞噬外部世界的帝国，将自然的边界悉数纳入其中。这就如同科幻小说中的巨塔，那些层层叠叠的建筑将世界各地的风景浓缩于其间：热带稀树草原、沙漠、雨林与森林。这些垂直空间将原本广袤的自然景观压缩成一座向上延展的微型宇宙。

9 睡眠之国：梦与死的交汇

摇篮与坟墓，令人迷失而忘却归路的迷人栖息之所；是无畏壮举的序曲，也是放下万物的终章。床象征着白昼喧嚣与礼仪的必要暂停。睡眠，如同死亡一般，消弭了一切的差异：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皆需休憩。对国王而言，睡眠是权力之上的尊贵安宁；但对农夫而言，则是沉重现实中的短暂怜悯。“睡觉，还是睡觉，这便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尽管卑微而低俗，却是诚心无比的愿望。”（波德莱尔语）睡眠是规律性地沉入深潭，不同于最终吞噬一切的死亡，它是能带来重生的短暂消逝。人们深陷柔软的被褥之中，仿佛披上另一层皮肤，追寻那至高无上的幸福涅槃。正如18世纪末，泽维尔·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所说：“我们在床上花费一半的人生，以忘却另一半生命中的忧伤。”在那个年代，人们甚至会邀请过路的旅人与他们同睡一张床。1976年，摄影师索菲·卡尔（Sophie Calle）邀请朋友和陌生人到她家中，与她同床共眠，并为此拍下照片。床因此重新成为一种可与伙伴共享独特体验的生活空间。尽管作为一种私密之物，床却也可以化身为社交场所：人们在床上招待客人，享用晚餐与早餐，甚至将床用作桌子、椅子，乃至临时法庭。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就曾在1969年3月25日于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床上接待国际媒体，以抗议越南战争并传递和平信息。对他们而言，床既是和谐的象征，更是一个平台与讲坛。与人共眠，比发生性关系更为亲密：它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放任与全然的沉浸，是对彼此毫无保留的交付。

作为休憩之地，床总在失眠与过度睡眠之间摇摆不定。随着岁月流转、年华渐老，失眠逐渐成为一种必须学会忍受，甚至与之共舞的生活方式。在极端的失眠中，它变成了一种彻底的体验，始终绷紧的神经再也无法松弛，恐慌与重生交织纠缠。当我们竭力追寻睡眠时，它却如同调皮的精灵般悄然逃遁；而当我们渴望清醒时，它却如同沉重的阴影般压得人喘不过气，令人陷入瘫痪般的无力之中。黎明前的微光时分，黑夜仿佛化作一纸无法辩驳的裁决，将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放大成巨大的幽灵，缠绕在心头，使人不堪其重、难以喘息。躺倒的人类是无助也最无防备的：黑夜将我们交付给恐惧与惊悚的深渊。躺卧的姿态本身便是一种赤裸的脆弱。睡眠中，人们穿着单薄，甚至几近赤身。若此时被外界侵扰，那种孤立无援的脆弱感便陡然加倍。那一刻，我们仿佛被钉在了一张不幸的床上，无法挣脱，动弹不得。然而，失眠有时也充满激情。当内心蕴藏着无尽的能量时，睡眠反而成为一种奢望，甚至是一种被剥夺的权利。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得不起身，不仅是为了找回理智，更是为了重新掌控自己的存在。失眠是一种无法忘却自我的状态：即使筋疲力尽，也依然无法放松、无法释然。人们仿佛背负了几个世纪的睡眠债，却提前透支了第二天的所有精力。无论如何辗转反侧，如何努力寻觅更舒适的姿势，都无法触及梦乡的边界。一句话或一个念头，宛如纠缠的

幽灵，在脑海中徘徊不去，久久盘旋。这种荒诞的清醒，像一位无形的哨兵，窥探着每一个瞬间，等待自我解脱的那一刻降临。然而，正因这种期待，它反而被无尽延长。最终，人深陷自设的牢笼，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被自身的存在绊住了脚步，难以向前。

弹簧床垫公认是1870年于美国问世，此处应为作者笔误。——编注

噩梦唯有在清晨透过百叶窗渗入的微光中，方才渐渐散去：公共建筑上传来的悠扬钟声；卡车鸣起的刺耳喇叭；楼房如同慵懒的动物苏醒时的轻微响动；小鼠轻快的爪步声唤醒了沉寂的宅邸；鸟儿的啁啾，甚至翅膀扇动时那一瞬的惊恐声。这些日常的声音伴随着光明的回归，宣告黑夜的终结。冬日暖阳微弱而苍白，夏日骄阳炽热而耀眼，它们强行将慵懒之人从温暖的被窝中拉出。直到这一刻，才算如释重负，仿若从深渊的束缚中挣脱的幸存者，带着未曾破碎的完整，依然真实地存在于人世间。睁开双眼，塞涅卡（Sénèque）的箴言仿佛在耳畔回响：清晨醒来，应心怀感恩，感谢众神让我们得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起床的瞬间，是从恐惧中挣脱，并赢得平静的胜利。仅仅坐起身来，便能感受到力量如潮水般涌回体内。我们从一个平躺的亡者，重新成为鲜活的生命。愤怒已然平息，怨恨渐渐消散，而接下来的活动将驱散疲惫，为我们重新注入生机。但并非所有的失眠都是负面的。在那些看似无力且漫长的黑夜中，人们打磨句子，为羞辱过自己的人准备犀利的反击，为让自己心神荡漾的人酝酿炽热的告白，甚至为棘手的问题找到解决之道。有时，奇迹会在黑夜的静谧中悄然降临：灵感的火花划破黑暗，一个推论悄悄成形，一个词语点亮整个思路。然而，这种恩赐极其稀少，多数时候不过是疲惫的心灵勉力构筑的虚妄之塔，最终散落为灰烬与尘埃。失眠者的创意火花，常如滥用药物或沉迷于数字超现实世界所催生的伪天才的灵感一般空洞；那所谓的“意识扩张”不过是一场虚假的膨胀，随着晨曦的降临，便如肥皂泡般在阳光中破裂，化为乌有。自古以来，人们便深知，睡眠绝非无足轻重之技，而是高品质生活的象征。而对梦境的解读，则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是一种伴随文明发展的命理学艺术。对于失眠者而言，最离奇的经历莫过于在某一时刻惊觉，自己其实睡得很好，并不需要更多的睡眠。而另一种稀有的奇迹，则是偶尔能够重温童年时那些可以整夜酣眠直至天明的记忆。从中世纪北欧发明的羽绒被，到1826年英格兰问世的弹簧床垫^②，再到亚洲传来的榻榻米与蒲团，这些发明无不属于悄然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隐形革命。而在乌克兰，甚至有人睡在蜂箱上。据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i Kourkov）解释，蜜蜂低沉的嗡鸣声有助于人们进入一种深沉而安宁的睡眠状态。

满足于自己真正拥有的睡眠时间，应当成为家居生活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修复性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少，而逃避式睡眠与坠落式睡眠则无法真正让人重新焕发活力。医学史学家告诉我们，断断续续的睡眠并非现代社会失衡

的产物，而是旧制度时期便有的常态。曾几何时，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凌晨三点依然灯火通明，喧嚣不息。有些人则将一生消耗在睡眠中，将其视为唯一真正的生活，仿佛把床铺当作裹尸布的预演。这正是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67年小说《沉睡的人》（*Un homme qui dort*）的主题：书中讲述了一名大学生，他的生活除了睡眠外再无任何寄托。他完全沉浸在一个既无未来也无过去的虚无状态中，间或在巴黎的夜晚独自漫步。“你坐在那里，只想等待，就那么等着，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在这种状态中，时间的概念悄然溶解，昼夜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随之消散。为了睡眠而睡眠，这是一种对终极虚无的体验。在清晨醒来，却是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时刻，是将那些维系我们的千丝万缕重新织入生活纹理的过程。关键在于怀抱轻快与满足的心情起身，用欢欣与食欲迎接新一天的开始。睡眠需要一种自律，而午睡则更应重新被珍视。它为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为大脑重新充电，让人重获活力，焕然一新。

GaFam即美国科技巨头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和微软的首字母缩写。——译注

夜晚来临，沉睡的人们去了哪里？在梦中，他们奔跑、攀爬、欢好、杀戮。如何得知那些紧闭双眼的背后是否藏匿着野兽般的影像，抑或是不合礼数的欲望？我们是该相信梦的预兆，还是将它们视为无意义的幻象？极权统治向来试图掌控臣民的梦境，这正是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é）那部引人深思的小说《梦宫》（*Le Palais des rêves*）的主题。在作品中，帝国设立了一种秘密的行政机构，专门收集并筛选全国的梦境，试图寻找所谓的“启示之梦”，以揭示未来，预防政变、战争与叛乱。然而，噩梦究竟是邪恶的预兆，还是一种对更深层恶行的保护？如何在“这片恐怖的海洋”中辨识出有意义的线索？这种试图控制与解读梦境的欲望，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科技巨头GaFam^①的目标——它们可能会打造“云梦境”的服务，用于追踪人们最隐秘的思绪。在恋爱关系中，入睡是一种逃避，让人得以短暂地脱离彼此的注视。嫉妒的恋人凝视着伴侣的睡容，却感受到她/他在无声中逐渐远离。在普鲁斯特的《囚徒》（*La Prisonnière*）中，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便是这样一个多面体：在她安详的睡颜背后，或许隐藏着另一个女子的面貌，正以这重身份迷惑叙述者。这名“囚徒”实际上是个逃亡者，她拒绝屈从于囚禁者的控制与占有。“我感觉自己触碰到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外壳，而她的内在早已通向无限。”叙述者用精美的礼物与昂贵的衣物为她织造了一座“珍稀服饰监狱”，试图将她永远困在其中。但嫉妒却如蛀虫一般啃噬着他，让他始终无法安宁。熟睡中的阿尔贝蒂娜似乎任由他的目光摆布，但这只是虚假的驯服，是即将逃离的预兆。“将她置于我的目光下、我的掌心中，我才有一种完全占有她的错觉，而这种感觉在她醒着的时候从未有过。”在她安睡的脸上，他仿佛看到了禁忌的欢愉与令人恐惧的希望。最终，这种预感成真：某天早晨，阿尔贝蒂娜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这种梦与欲望的矛盾，与川端康成

《睡美人》（*Belles Endormies*）中的情景遥相呼应。在这个故事中，纯真的少女被药物麻醉，赤裸的身体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年迈而怀旧的男人们痴迷的目光之下。这些老人支付高额费用，只为沉浸于这静止的青春中，试图在这不设防的美丽姿态里找回失落的生命力。而在奥勃洛莫夫的童年记忆中，整个宅邸仿佛都被一种沉睡的疾病笼罩：仆人在厨房里昏昏欲睡，狗在狗窝中懒散地打盹，整个庄园则沉浸在呼噜声交织而成的交响乐中。

10 数字幻境抑或颓废的胜利？

Albert Hirschman, *Bonheur privé, action publique*, Fayard, 1983.

单子 (nomades) 是一个哲学概念，指反映世界秩序的最基本的实体，从单子中可以推出物质的属性。单子的说法最早由毕达哥拉斯学派使用。而单子概念则是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一书推广开的。他认为每个单子都是独立的、封闭的，都反映、代表着一整个的世界。然而，它们通过神彼此互相发生作用。——译注

“小拇指姑娘” (Petite Poucette) 是塞尔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也被他用来比喻在屏幕上滑动手指的数字时代的居民。他对数字世界抱有积极的态度，认为它能为人类带来无限开放的前景。——译注

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认为，个人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摆荡是一种热情与幻灭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公民厌倦了消费主义的空虚时，他们会投身于政治行动；而他们在激烈的斗争中感到疲惫时，又会退回到私人领域；随后再度参与公共事务，如同钟摆般反复摆动。^⑫ 纵观历史发展，人类社会经历过无数这样的退隐，而紧随其后的往往是活力的爆发。例如，茧居族 (cocooning) 一词，最早由营销顾问费丝·波普科恩 (Faith Popcorn, 化名) 在1987年提出。这位“营销界的诺查丹玛斯”因此备受媒体嘲讽。然而，这一概念的真正奠基人却是英国作家爱德华·福斯特 (Edward Foster)。在他的短篇小说《机器》

(*Machine*) 中，他描绘了一个由孤立单子^⑬组成的未来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密闭的单元中，彼此仅通过电子设备交流。如今，我们无法断言人类社会究竟会走向孤立的并列，还是迎来集体的觉醒。也许在经历了新冠疫情这一噩梦与乌克兰战争的阴影后，欧洲会再次焕发活力，重新振作。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两个重大变化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时代。首先，一种为了恐惧、因恐惧而生的恐惧政治在全球范围内浮现，以联合国和众多非政府组织为首，围绕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疫情等核心议题展开，营造出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使恐惧深植于人心；其次，全球互联的普及带来了对无限广阔的新狂热，这种体验堪称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它声称能够将人类的心灵扩展至行星的尺度。然而，这种扩展却充满矛盾：网络将“他者”置于括号之中，其存在仅是符号化的，而非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这正是交友网站面临的核心挑战：如何将用户上传的完美照片与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缺陷的真人联系起来。网络试图解决人类的二元矛盾——抽象的人与具体的公民，抽象的“人类”与具体的“人性”。然而，这种普及知识、促进宽容与团结的救世主式的信念，最终却导致了一种新的封闭。如同现实生活一样，网络用户仍按照兴趣、信念与身份划分为部落与群体。表面上，我似乎将渺小的自我提升到了全球的高度。实际而言，我仍囿于自我之中：在这个系

统内部，“他者”的存在仅限于与我相似之时。我们的重心始终在自身，世界不过是围绕它旋转罢了。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小拇指姑娘”^⑩，或许更适合被称为“拖鞋小姑娘”（Petite Pantouflette）。

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译注

令人费解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都沦为了笨拙的“伪间谍”，被密码、访问代码和系统更新牢牢控制。日常生活俨然变成了一场复杂的解谜游戏：支付电费、取款、预约医生，都需要动用一套堪比情报部门装备的工具。每位消费者既是不自知的“秘密特工”，又是一个随时需要自证清白的“嫌疑人”。而一旦失败，等待他的便是算法的冷酷训斥，甚至直接被“取消”。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昨天还在游行抗议健康通行证（其中一些极端分子甚至称之为“纳粹通行证”）的人，却同时活跃在Instagram、Facebook、TikTok等社交平台上，将自己的隐私生活毫无保留地暴露给GaFam或BATX^⑪。这些科技巨头不仅可以随时追踪他们的每一步，还能在需要时直接对他们实施审查。而这些人竟浑然不觉，反倒热情地拥抱着这个监控无处不在的社会。虚拟世界如同电子游戏，让人们借助虚拟角色进入一个无处可寻的“彼岸”。借助沉浸式头盔，他们可以体验各种精彩绝伦的冒险：成为探险家、海盗、雇佣兵、罪犯或黑帮老大。[然而，这也引发了复杂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例如，在元宇宙（Metaverse）中，我是否需要对我的“分身”所犯下的罪行负责？谁是罪犯？是我本人，还是我的多个“人格”？虚拟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对性侵害的控诉：2021年12月，一位用户声称，她的虚拟化身在虚拟现实世界“Horizon Worlds”中遭到了性骚扰。]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创造新的身份，如2003年推出的网络虚拟社交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让用户通过虚拟平台（如Roblox）探索无数想象中的星球。它提供了一种时而循规蹈矩，时而天马行空的平行生活，因此深受青少年的青睐。在这里，用户不仅可以展示自己，还能测试自己的能力，甚至尝试与新伙伴建立联系。

对于品牌而言，虚拟世界无疑是一片充满无限投机机会的沃土。在这里，人们可以用加密货币购买虚拟土地，在线试穿3D版的高端时尚服饰，甚至试驾未来的新车，而这些商品最终都会在世界中交付使用。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盛宴，但值得深思的是：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边界的拓展，还是对日常活动的机械化复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99年那部具有前瞻性的电影《黑客帝国》

（*The Matrix*）。影片描绘了一个被计算机“矩阵”奴役的人类世界：人们将眼前所见误以为是真实，并坚信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尽管这一系列电影后来逐渐演变为飞天忍者与玄奥哲学思辨的结合体，但首部《黑客帝国》依然堪称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的经典之作。诺斯底主义主张，这个尘世不过是由邪恶造物主精心编织的骗局。要让人类对这片土地心生厌恶，只需告诉他们——正如许多

宗教所宣扬的那样——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狱，或是一个需要通过一切手段撕破的虚假幻象。

昔日的冒险家扬帆出海，探索未知的世界。而如今，他们只需手握操纵杆，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安然躺在家中便可。无论脚上穿的是运动鞋、凉鞋，还是高跟鞋，只需一个手柄，人们便仿佛穿上了“七里靴”（bottes de sept lieues），轻而易举地穿越至平行宇宙。设想一下，数百万个个体沉浸在感官舱中，随外界发送的刺激信号而微微震动。那些曾经充满冒险精神的远行和极致的感官体验，如今不过是在一张躺椅上完成的轻松旅程。虚拟现实教会了我们什么？它教会我们如何坐、卧。在那里，我们通晓了久坐的艺术。只有习惯于静止的躯体，才能构建出一个同样静止的社会——一个让人们安分守己、待在家中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其大脑注意力的社会。屏幕，无论大小或形状如何，俨然成了双眼的安神茶：它既不禁止也不命令，却以无声的方式让一切与之无关的事物变得无足轻重。它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身以及屏幕本身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后疫情时代的文明象征或许不再是火箭、摩天大楼，甚至核反应堆，而是一个更加卑微的发明——智能椅。这种座椅介于躺椅与床之间，配备可调节靠背和传输电缆。21世纪的公民是什么样的？是蜷缩在感官舱中的人类。他戴着听觉与视觉的“假肢”，被多重娱乐形式环绕，而让自己的数字分身替他去体验那些他已不再允许自己触碰的生活。而他本人，却依然深陷前所未有的孤独。

日本社会中的极端个案早已为人所知：那些被称为“家里蹲”（hikikomoris）的青少年，彻底与世隔绝，日复一日地守在屏幕前。他们面色苍白，目光警惕。家人只能通过门缝递送餐盘，勉强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而他们的沉迷却无休无止，深陷于所谓的“互动孤独”（solitude interactive）之中。对他们而言，真实世界仅存在于电脑之中，物理世界不过是多余的附件。在增强现实的头盔中，屏幕离眼睛越近，现实便消失得越快。这种强迫性久坐的代价之一便是肥胖。这种由过度喂养引发的全球性疾病，已成为现代儿童与青少年的重大隐患，同时也是久坐不动的典型病理表现。研究表明，夹杂在动画片之间的食品广告显著加剧了儿童的高血压与肥胖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肥胖症”

（infobésité）：人们无休止地摄入新闻、图像与食物，逐渐变得像被程序操控的机器人一般。永不停歇的娱乐世界同样是一种饱和的世界：人们的生活被不间断的节目与游戏填满。疫情期间，法国人以“零食冠军”和“冰箱窃贼”之名，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道，在体重秤上屡创新高。吃、睡、消化——身体被还原为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而肌肉与生理系统则陷入了一种近乎麻痹的停滞状态。过去两年拍摄的电视剧中，演员们的身形随着剧集的推进而逐渐“膨胀”，这无疑成为封控生活最直观的写照。这种现象就像是2008年的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Wall·e*）的翻版。这部反乌托邦式的讽刺片描绘了一种肥胖的人类，流亡至遥

远的星球，丧失了作为双足行走物种的基本能力。在脱离工作的束缚与行政控制的安逸环境中，人类依靠鼠标和遥控器，将整个世界“握”在手中。

20世纪末，美国人创造了“沙发土豆”（couchpotato）一词，用以形容那些瘫在沙发上，一边狂吃薯片，一边盯着电视屏幕的新型“变种人”。这些人宛如巨婴，通过嘴巴和眼睛不停地摄取营养与信息，却完全处于被动“灌养”的状态。电视与电子游戏早已化身电子保姆，牢牢粘住了孩子和父母，将他们固定在屏幕前，深陷于一种无节制的屏幕依赖（téléphagie compulsive）。这些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允许人们“浮游式”地聆听——你可以让它们开着，同时去忙其他事情。然而，它们也将我们牢牢禁锢在住所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自主性逐渐丧失之际，人们花在这些媒介上的时间显著增加。它们成了养老院老人的“镇静剂”，是一种随叫随到、无比顺从的“陪伴者”，用声音、画面和色彩填满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新一代的智能设备更胜一筹：配备合成语音和模拟共情能力的智能机器——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尘器、搅拌机、咖啡机，以及各种高端家电。这些设备在家中营造出一种“亲密感”的假象，但实际上却悄然扮演着监视者的角色。

在数字世界里，人们以为自己在拥抱广袤无垠的天地，实际上却迷失在虚无之中。头脑被无数无关紧要的图像与琐碎的情节塞满，而所谓的“世界之魂”

（l'âme du monde），不过是一只虚幻的气球，只会揭示其自身的空洞与虚无。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依靠一个完美无缺的数字分身，享受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仿佛置身于一间虚拟托儿所。然而，所谓人类心灵的扩展，实际上只是一场通过双眼缓慢流失自我的过程，一场无声无息的自我消耗。而所谓的“增强现实”，更像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截肢”。传统的虚构文学曾是时代幻灭中的避难所，不仅能填补人们的某些遗憾，还能让他们重燃对现实的兴趣，使人感受到现实的美妙与矛盾。小说、电影和戏剧让我们超越生命的局限，体验多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远超自身能够经历的范围。而在虚拟世界中，人们甚至无法真正体验一段完整生命，只能面对一个经过计算机生成的3D假象。二者的区别在于：虚拟世界让人沉浸于一种行动的幻觉之中，仿佛自己正在战斗、旅行，而阅读则仅仅调动我们的想象力；玩电子游戏时，人们能够获得真实的身体感受，而阅读一段文字、欣赏一幅画作、聆听一段音乐，则激活了大脑中其他的区域。借助虚拟现实设备，人们仿佛亲身参与了剧情的发展，而在阅读时，人们则始终“置身事外”。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将经典的小说叙事与视觉沉浸结合，通过融入音乐、图像与动态效果，“您是本书主角”式的互动式小说可能会再次回归，焕发新生。然而，互联网本身早已取代了所有外部世界的可能性，而物质世界仅仅沦为一种残存的存在——一个起点而已。在虚拟空间中，我们“在此”却又“不在此”，无处不在却又无处真正存在。这种虚拟的存在感充满诱惑力，让人上瘾，难以戒除，甚至难以回归现实生活。

即便是像去电影院这样简单的活动，如今也变得令人纠结：为什么要离开家，走进一间黑暗的放映厅，与一群陌生人坐在一起，观看一部可能会让人失望的电影，明明可以在家中的大屏幕上无限畅选？（2022年，法国剧院和电影院的观众人数已下降近40%。）如今，天堂触手可及，就在家中客厅。与陌生人接触不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负担。那些大型的集体仪式——外出、晚会、庆典等——很可能会逐渐减少，甚至被彻底转移到虚拟世界中。凡是能在沙发上完成的活动，都将优先取代以往的外出娱乐：无论是观影、看戏，还是聆听音乐会，都无须离开家门。更何况，如今只需轻点应用程序，外卖便能送至家门，甚至连“订购”性伴侣也不再是难事。歌手们已经可以通过电子游戏平台举办虚拟演唱会，观众则通过自己的虚拟化身“亲临”现场。我们甚至可以在虚拟家中的墙上挂上德拉克罗瓦、马奈或梵高的画作。只需坐在椅子上，透过屏幕，便能浏览极地的冰川风光或沙漠的浩瀚景色，甚至还能穿越时空，探访维京村庄，或置身未来的太空站。（当然，“未来主义”这个词，无非是后天就会过时的代名词罢了。）社交网络不仅将我们“牢牢钉在沙发上”，还赋予了私人空间支配无限宇宙的错觉。这无疑为商业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但这难道不是一个拙劣的“奇迹”吗？拥有一个数字身份、虚拟化身和加密货币钱包，但它们并未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丰富。整个地球如今似乎已经缩减为一座巨大的公寓，宛如一个玩具屋，或是供孩子们玩耍的微缩世界。这看似是一个避难所，一片让人从伤痛现实中“撤离”的和平港湾。

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言，现实中的居所与我们梦想中的家之间，总是充满张力。无论是茅舍、别墅，还是宫殿，没有一种住所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对安全与冒险的双重渴望。一旦跨出家门，我们便直面外部世界，一个既充满未知与危险，又蕴藏兴奋与刺激的领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提到“一种仅专注于自身的私人生活的悲哀厚度”。而如今，这种悲哀又被互联网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一个视觉上的袖珍剧场，看似无垠，却浅薄至极。在这个剧场里，人们误以为自己在拓展生活的边界，实则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坐在扶手椅上，我们一边端着饮料，一边沉浸在充满暴力与恐怖的剧集之中，体验虚拟的“堕落”。我们屏住呼吸，毛骨悚然，仿佛置身于危机四伏的情境中，最终却心安理得地上床入睡。于是，我们在无意识的麻木与被动中，承受着一种双重惩罚。

布波族（Bourgeois-Bohèmes），又称BoBo族，指的是拥有较高学历、收入丰厚、追求生活享受、崇尚自由解放、积极进取的、具有较强独立意识的一类人。——译注

康德曾说，学校的职责就是教会孩子如何“坐得住”。这一教训显然被牢牢记住了，不仅延续到了学龄后，还在教育体制光环褪去的当下得以进一步强化。20世纪末，两位法国漫画家，卡布（Cabu）和克莱尔·布雷特舍（Claire

Bretécher) 分别通过作品《大个儿杜杜什》(*Grand Duduche*) 和《苦闷者》(*Frustrés*)，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生理状态的一种新变化，他们描绘了一幅人类后代逐渐弯腰屈膝的图景。一边是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反军国主义的青少年，懒散地窝在扶手椅里；另一边是瘫倒在沙发上的“布波族”^⑤，即1968年后变得郁郁寡欢的中产阶级左翼人士。这些形象共同勾勒出一一种新型人类学特征：一种再也无法挺直脊背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一种“心理侧弯”已然渗透富裕国家的文化之中。如今，这种人类学上的退化现象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数字化。早在1998年，美国华盛顿的一位年轻女性就在互联网上创建了一个网站，允许人们全天候24小时观看她在家中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最琐碎的日常事务。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创举，却悄然撼动了影像世界的格局。而窥探欲的巅峰，则出现在2001年4月法国推出的真人秀《阁楼故事》(*Loft Story*，改编自美国的*Big Brother*)。该节目将11位单身男女关在一间布满摄像头的公寓中进行全天候、无死角拍摄，唯一的隐私空间只剩下卫生间。而这档节目的高潮，是洛阿娜(Loana)与让-爱德华(Jean-Edouard)在户外泳池中上演的激情场景。自此之后，这种模式迅速普及，Instagram、Facebook和TikTok等数字平台将这种“直播日常”无限放大：从淋浴到用餐等日常琐事，到最私密的亲密场面，无所不包，一切都被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除了炫耀，这类行为背后还隐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梦想：用镜头记录自己的生活，赋予它如同部长篇电影般的质感，为平淡的日常披上一层虚假的冒险外衣。水煮蛋在锅中“惊心动魄”地翻滚，一份五层汉堡端上餐桌的“奇迹”！这一切仿佛都值得用自拍杆精心捕捉，用特写镜头和全景拍摄加以渲染，然后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晒出一段婚姻生活的“和谐片段”，就成了一张幸福的“官方认证”。我的生活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清晨的早餐、一跃入水的欢愉、婴儿的第一颗乳牙，每一幕都能换来成百上千的点赞。在这些瞬间，我是世界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掌舵人。过去，人们躲在家里是为了避免被人看见；而如今，人们“隐藏”起来，却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己，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毫无保留地铺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YouTube主播、网红、博主通过推荐美容或时尚产品赚取丰厚的利润。他们的自我展示已然成了一部“关于自己、为自己、由自己主导的伟大叙事”。甚至那个站在厨房里随TikTok镜头扭动的青少年，也渴望成为焦点，哪怕他无法在夜店与数千人同舞。视频与社交网络已经全面接管了昔日属于日记本的角色，但不同的是，文字的记录需要筛选加工，强迫读者一页页地阅读，而镜头则记录下生活的一切：从塞满的垃圾桶、排空的浴缸，到生长中的生菜、轰鸣的吸尘器，甚至连入睡与起床这样的琐碎瞬间都不曾遗漏。与其说是自我监控的泛滥，不如说是对外界目光下“完全可见性”的无尽追求。当私人领域的意义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时，那些原本属于亲密关系中“不可见”的隐私，却被堂而皇之地推向公共领域：日常的点滴琐事、无人关心的生活细节，这些原本仅属于伴侣之间的私密内容，如今却成了公众的“共享资源”。

悲观主义者或许会说，这是秘密的终结。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早已泄露的秘密，因为它被所有人共享。我们既渴望验证自己的平凡，又努力追求某种独特。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人愿意为这种乏味至极的日常赋予意义，甚至沉醉于这份虚无，仿佛它是一场扣人心弦的冒险。我们的生活充斥着一种修道院式的单调气息，但这是一个“联网的修道院”。或许，这种对时光分秒不差的记录，是在试图安抚年青一代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焦虑，向他们传递一种微妙的信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正经历着相似的命运。互联网同时也扮演着窥探我们生活的“超级密探”。那些粗鲁无礼、不知分寸的恋人，随意泄露的照片或视频，将禁忌的裸露与不正当的亲密行为公之于众，仿佛重现了秘密警察的黄金时代，让人因隐私的曝光而感到羞辱。卡夫卡（Kafka）在小说《地洞》（*Le Terrier*）中，描绘了一个男人像鼯鼠一样藏身地下，以逃避外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卡夫卡未曾预见的是，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那些最隐秘的东西如今被彻底暴露，成为一出公开上演的剧目。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主动配合下，我们心甘情愿地被推向大众的目光，只为换取一种虚假的互惠满足。私人领域已经被彻底社会化，我们内心的圣殿成了我们最主动暴露的存在。正如佩索阿（Pessoa）所言：“在我内心深处，我已仅仅作为外在存在。我是一座活生生的舞台，不同的演员在此上演各自的剧目。”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Idées, Gallimard, paragraphe 26, p. 43.

尼采曾写道：“每个卓越之人都渴望退隐于一座堡垒，那是一处避难所，使他得以脱离人群，挣脱庸众，从那压倒性的大多数中解放出来。在那里，他可以遗忘那些他所超越的世俗规范。”^⑤然而，当这种退隐的渴望演变成为一种集体趋势，甚至成为群体的标志时，“卓越之人”便不得不离开堡垒，以避免自己沦为他曾鄙弃的大众之一。如果“家”最终取代了公共空间，成为这个世纪的主旋律，那么每个人都将被迫在私密的住所中重建一个微缩的替代世界。存在的乐趣将退化为用“氛围”代替真实的事件，用“视觉漫步”取代真实的探险。唯一的变化，不过是从椅子到沙发、从床到浴室那短暂的移动。我们的“迁徙”不过是从客厅到厨房，再从厨房返回客厅的循环往复。然而，这种毫无障碍、无须冒险的自由，是否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替代品？当世界的大舞台被压缩进屏幕的一扇窗口时，生命的广阔是否也随之消解？曾几何时，私人生活依赖“外部”才能得以完整——它本质上的未完成状态，恰恰是它唯一的特权。而如今，在互联网枝蔓般的无尽延伸下，私人生活变得孤立且自足。它陶醉于自身的镜像，沉迷于虚假的投影，却误以为那些幻象就是现实。

11 狄德罗的睡袍

见Albert Hirschman, *Bonheur privé, action publique*, op. cit., pp. 91-92。

亲密关系的胜利首先表现为家政学的复兴，同时也体现在男性重新介入那些传统上归属于女性或仆人的活动中。这不仅意味着对生活空间和厨房的重新投入，更代表着对生活用品那种“熟悉的陌生感”的重新审视与关注。然而，从18世纪起，一些保守派始终对家居用品秉持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斥之为“琐碎装饰”

（卢梭语）、“无足轻重的小商品”（罗伯斯庇尔语，Robespierre），或“无聊的小玩意”（亚当·斯密语，Adam Smith）。一个世纪后，波德莱尔更是愤然抨击所谓的“器具狂热者”，而福楼拜则在第二帝国时期愤怒疾呼：“让我们唾弃那些丝棉手套、办公椅、雨衣、节能加热器、伪劣织物！让我们痛斥虚假的奢华与矫饰的自负！工业主义将丑恶推向了难以想象的极致！”^② 在家中烹饪的幸福，是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中，将蔬菜、肉类和淀粉制品化作美味佳肴；是使用那些具有神奇功能的新装备——它们能削皮、烹饪、搅拌、加热，为您服务，甚至与您对话；是用一口平底锅便能召唤整个宇宙；是彻底清洁房屋，整理床铺、洗涤衣物、打扫卫生。毫无疑问，这显然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些事务不再专属于母亲或妻子，而是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责任。男性重新参与家务劳动，有些人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惩罚，是特权的终结；但另一些人则将其看作一种丰富的体验和自我扩展。这种角色的转变意味着能力被延伸至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或许家政学未能完全解放女性，但它确实为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正如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在他的经典歌曲《进步的悲歌》（*Complainte du progrès*）中唱到的“鼻涕虫熨斗、原子搅拌机、鸡皮去皮器”，看似微不足道，却不可或缺。当下，我们沉迷智能机器人、照明器材和联网设备，这些机器的说明书复杂得甚至需要高智商才能读懂。我们手拿扫帚、拖把和锤子，就像我们的祖先挥舞刀叉剑戟一般。整理住所，其实也是在呵护我们的灵魂。当一间公寓井然有序时，心灵也随之变得清晰，思绪得以自由流转。

Le Monde, 3 décembre 2021, 《Tout le monde n' aura pas sa charentaise sous le sapin》.

见Luc-Michel fouassier荣获“《电视全览》书商奖”的精妙短篇小说，*Les Pantou es*, Folio Gallimard, 2020。

在这场自我回归的浪潮中，睡袍、毛毯和拖鞋再次展现了它们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拖鞋呢？拖鞋是鞋靴的柔和延续，是奔波之足的安然归宿。它宛如一个柔软而温暖的茧房，是从动到静的过渡之器。轻盈如翼的双足，钻入毡布与羊毛的

温暖怀抱，甘愿永远栖息在这舒适柔软的包裹之中。因此，在疫情期间，拖鞋市场的爆炸式增长甚至引发短缺和供应链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⑩这种“静默鞋”成了隐退与舒适的象征。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英雄、冒险家或斗士们穿着毛绒拖鞋的模样。比起皮鞋或运动鞋所传达的动感节奏，拖鞋所带来的静默与安逸总是显得逊色许多。^⑪我们看到那些受人敬仰的艺术家、作家或杰出的演员穿着拖鞋时，总会不禁涌起一股令人失望的平庸感。这时，或许我们会想起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仆人眼中无英雄。并不是英雄非英雄，而是仆人只是仆人。”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后英雄时代，一个不再鼓励追随英雄主义足迹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宣扬自身作为受害者的神圣性，而非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那些穿着木底鞋、凉鞋或拖鞋外出购物的人，其实只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居家的人，仅仅是短暂地踏足外部世界，随即便会回归到他们的私人空间。睡袍犹如一层轻薄的“皮肤”，在人们起身离开床铺、换上社交服装之前，为身体提供短暂的遮掩。然而，若是满足于只穿睡袍的生活，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对仪态的要求，而选择了唾手可得的舒适？那些穿着拖鞋的佣兵和披着睡衣的女战士，高调地宣称着自己对现状的满足，即便这种满足以某种程度的放纵为代价。然而，自在不应首先体现于挺拔的身姿及对自身仪表的关注之上吗？

Brian Fagan et Nadia Durrani, Une histoire horizontale de l'humanité, Albin Michel的法译本, p. 219。

睡袍自古以来便是备受喜爱的衣物。最初，它多为男性穿着，兼具优雅与实用性。后来，女性也用它覆盖睡裙，以御寒保暖并掩盖身体。这一平凡的衣物背后，还藏着一段趣闻：1747年到1765年间，狄德罗（Diderot）在撰写《百科全书》（*l'Encyclopedie*）的部分条目时，常身着一件蓝色睡袍。但是，他的赞助人、著名的沙龙主办人若弗兰夫人（Madame Geoffrin），趁狄德罗外出之际，不仅重新粉刷了他的房子、更换了家具，还丢弃了那件饱经风霜的旧睡袍，换成了一件奢华的丝绸睡袍。尽管狄德罗勉强披上了这件新睡袍，却始终无法忘怀那件陪伴他多年的旧睡袍，并赋予它极高的评价。这件旧睡袍是他归属感的象征。他深情地说道：“为什么不能留下它？它已与我融为一体；我也与它融为一体。它贴合了我身上的每一层褶皱，却从未让我感到束缚；穿上它，我显得自然、生动，甚至富有魅力。而这件新睡袍，僵硬、刻板，将我变成了一个毫无灵魂木偶……当书本积满灰尘时，它的一角会起身轻轻拂去；当羽毛笔的墨水干涸时，它的笔尖会侧身斜斜抹上。那一道道又长又黑的痕迹，便是它曾为我服务的见证……这些痕迹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印记。而如今，我看起来像个富贵闲人，人们无从辨别我的身份……我的旧睡袍与周围那些陈旧家具是如此协调，彼此融为一体。而如今，一切都变得不和谐，失去了统一感，也失去了那份难以言喻的美。”这种奢华的闯入让狄德罗感到心碎。奢侈品摧毁了他家原本的统一与和谐

——一把草编椅、一张木桌、一块松木板的质朴搭配。而那件旧睡袍，不仅是一件普通的室内服饰，更是一件创作工具，甚至可以说是作家的制服，承载着这个职业的特质：双手和衣物上沾满墨渍，都写满了工作的痕迹。这件旧睡袍不仅温暖了狄德罗昨日的身体，还记录了他昔日的青春与活力。它去除了狄德罗身上大师的神圣光环，呈现出一个朴素而真实的作家形象——不拘小节、在私人空间里自在松弛的人。作家并非神圣不可及的存在：狄德罗的睡袍，正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 sébastien Mercier，启蒙时期多产但如今鲜为人知的作家）的《睡帽》（*Bonnet de nuit*）、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斗篷，以及奥勃洛莫夫的拖鞋，这些都只是普通人的日常配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对浪漫主义诗人或“受诅咒艺术家”的刻板印象——那些穿着燕尾服、系着领巾与蕾丝装饰的人——的瓦解。这些物件犹如成年人心灵的“安抚物”，即温尼科特（Winnicott）所说的“过渡性客体”，用以帮助人们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如果狄德罗生活在今天，他可能会穿着运动服或短裤写作。不过，他对睡袍的依恋至少并未妨碍他走向远方——以当时的标准而言，他走得远且想得更远。他到莫斯科拜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以一种如今已逐渐消失的乐观与热情，去拥抱那广阔的世界。更近的例子则是温斯顿·丘吉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常常在床上运筹帷幄，“以一种古怪而潇洒的混合方式”^⑧指挥英国的战事。他那红金相间的睡袍，将他塑造成一副中式文人的形象，后来也成为他抵抗纳粹暴行的象征。

同上书。

Le Monde, jeudi 10 mars 2022, Raymond Depardon, Kamel Daoud,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Algérie 1961-2019.

有人曾撰写过一部《人类平躺史》^⑨。未来或许会有人书写一部《人类坐姿史》，描绘人类身体从站立到蜷缩于长椅或沙发的演变。他们仿佛一种新兴物种，以介于站立与躺卧之间的姿态，慵懒地半卧在座位上。传统观念认为，外出工作或散步时，应精心打理自己，注重衣着与仪表。正如列维纳斯所说：“最微妙的社会关系总是在形式中完成的。”然而，当私人空间的松散状态被带入公共领域时，就容易引发“随意”和“不修边幅”的蔓延，这是一种对他人缺乏在意、不愿用心装扮的态度。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正如麦当劳的口号“做你自己”所传达的那样——人们不加掩饰，甚至不再在意外界的评价，展现出一种毫不做作的“本真状态”。然而，与此相对的是，迈出家门意味着走出自我，意味着用心穿戴、为他人呈现出一种精心准备的形象。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在与雷蒙·德帕东（Raymond Depardon）谈论他的祖国阿尔及利亚时，将其描绘为“一个封闭的国家，每个人都穿着拖鞋和睡衣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

^⑧独裁政权让公民远离政治，剥夺他们接触世界的权利，甚至让他们逐渐丧失了穿衣打扮的习惯。而当民主制度陷入病态时，懒散与放任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那

么，这种变化的风险是什么？疫情过后，私人生活的态度可能渗入公共空间：每个人都穿着拖鞋、短裤和T恤漫步街头，无视他人的评价，拒绝遵循社会规范。原本周日穿睡衣去买羊角面包只是一种偶尔的规则突破，如今却可能演变为生活的常态。众所周知，球迷衫长期以来就是足球或橄榄球比赛爱好者的“制服”，他们穿着它，瘫坐在沙发上，一边嚼着花生，一边喝着啤酒。这种装扮或许是对场上奋力拼搏的球员的一种最低程度的模仿。然而，如果生活仅仅是对舒适的追求，我们的文明就将难以维系。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或许会见证对这种懒散状态的强烈反弹：形式主义将卷土重来，可能会掀起一场服饰精致化的潮流。人们对优雅穿着的渴望，将成为对普遍松弛与退化的一种有力对抗。

12 现代性的逃逸者

面对困扰我们的种种弊病，我们怎能不追思19世纪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学思潮？它既针砭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又质疑精英的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似乎被撕裂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埋头工作、积敛财富，服膺于理性计算的冷酷逻辑；另一方是反抗者，他们分裂为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者与反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革命者。他们唾弃庸俗的资产阶级及其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在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抗议声此起彼伏，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家与年轻画家的叛逆之言不绝于耳。然而，在这场对峙中，一个屈指可数的第三阵营悄然浮现——生活的逃逸者。他们既不反抗，也不工作。他们拒绝自己的时代，选择对存在发起罢工，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这一立场。即便浪漫主义自1830年起逐渐左倾，试图洗刷其被指责为资本主义遮羞布的恶名，这些逃逸者依旧无意加入任何阵营。他们既拒绝资产阶级，也拒绝反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躺平的人生与夭折的人生共享同一条轨迹。这群革命风暴中的逆子不愿为未来播撒种子，而是希望未来成为一片贫瘠的荒原。他们既不创立学说，也不追随学派，而是将这条思想暗线潜藏在过去两百年的诸多作品之中——从德·梅斯特到佩雷克，以及其间闪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贝克特和卡夫卡（尽管这些作家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思潮）。他们唯一的激情是扼杀激情，唯一的欲望是压抑欲望。即便是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平庸，在他们眼中仍显得过于喧嚣躁动。这些平民渴望的是一种绝对的宁静。无须宣言、不用纲领，仅凭一股冷却一切的意志，便足以成为治愈现代世界癫狂的最佳解毒剂。这些平庸的追随者信奉无为的真理，推崇静止的伟大，执着于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口中“低空飞行的存在”（l'existence a basse altitude）。

Xavier de Maistre, *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 présentation par
orence Lotterie, Gf, pp. 48-49.

见Frédéric Beigbeider, *Bibliothèque de survie*, L' observatoire,
2021, pp. 125-126。

在法国文学中，最先赞颂室内生活的作家，非泽维尔·德·梅斯特莫属。1795年，他写下了《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这是一部与以往那些描写冒险远行与英雄征服的叙事背道而驰的作品。德·梅斯特因与一名皮埃蒙特军官决斗而被软禁于都灵，正是在这段幽禁时光中，他创作了本书。德·梅斯特堪称“反卢梭”式的人物：卢梭是永不停歇、不知疲倦的云游者，曾徒步穿越过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而德·梅斯特则被法庭判罚，被迫在一间仅有一名仆从的豪华房间中度过漫长的禁足期。作者用42章细致地描述了这间房间的种种魅力所在：从睡榻到衣柜，从爱犬罗西娜到仆人乔内蒂，从书籍林立

的书架到墙上精致的铜版画。这间房间，最终成了书中的真正主角，它不仅是作者沉思的空间，更是激发灵感与遐想的精神舞台。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一个死囚的末日》（*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 à mort*）中便借鉴了这一叙述手法。这场“静止之旅”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创伤的一种回应。正如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écaméron*）中的那群青年男女，为逃离1348年肆虐佛罗伦萨的黑死病选择隐居乡间。德·梅斯特同样讴歌了这种能够保护人们免受世间丑恶的避世状态。深陷幽禁之中的他意识到，即便生活再困苦，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人们仍能凭借阅读、遐想与梦境，摆脱痛苦，超越苦难，而不会因此感到屈辱或低人一等。原地旅行有其独特的优势，无须花费分毫，不必承担风险，穷人可享，胆怯者适宜，懒惰者尤爱。“起来吧，怠惰之民！”来场无须远游的旅行吧！这种“室内想象力”引导人们从床榻到单人沙发，再从单人沙发到玄关，强调的不是直线前行的高效，而是曲径通幽的自在。这种体验看似单调却不乏妙趣。“温暖的炉火、几本书、几支笔，便足以抵御无聊。而当我们放下书和笔，专注于拨弄炉火，任思绪翩跹，沉浸于温柔的冥想，或随性编撰几句诗行来取悦友人时，那更是无尽的愉悦！时光便在这样的静谧中悄然滑落，无声地坠入永恒，而我们却丝毫不曾察觉其悲伤的流逝。”^①在温暖舒适的床榻上，作者展开翩然想象，踏上一场通往最奇幻世界的精神之旅。阅读德·梅斯特的作品时，仿佛在翻阅2020年那一年中层出不穷的“隔离日记”。房间成了无数潜在旅行的起点——尽管这些旅行从未真正发生过。德·梅斯特为仆人与爱犬的忠诚潸然泪下；当他凝视那位优雅的公爵夫人肖像时，灵魂便能“瞬间跨越千万里的距离”。他与著名学者及古希腊哲人（如柏拉图）展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部作品看似自嘲幽默，叙述中亦不时自我解构，然而，这场旅行却在无声中催生了人造的狂喜和虚妄的惊叹，在对封闭生活颂扬的背后，潜藏着对逃离的深切怀念。德·梅斯特以轻盈笔触掩饰内心的苦涩，^②并从斯特恩（Sterne）的《感伤的旅行》（*Voyage sentimental*）中汲取灵感，由此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自我探索的文学潮流。这部充满讽刺与智慧的作品，后来被无数次模仿，甚至在1798年还出现了一部名为《我口袋中的旅行》（*Un voyage dans ma poche*）的作品。

克莱芙王妃（Princesse de Clèves）是法国女作家拉法耶特夫人（Madeleine de la Fayette）创作的同名小说《克莱芙王妃》的女主人公。——译注

如今，面对历史洪流的剧烈动荡，人们越发倾向于退守到那些每寸土地都尽在掌控的小空间里。那些被世界吓得魂飞魄散之人，常幻想自己是孤岩上的修行者，或是奢华安逸的现代隐士。正如泽维尔·德·梅斯特所言，房间“这片令人陶醉的国度，蕴藏着世间所有的美好与财富”。这种室内想象与对牢狱的想象何其相似，尽管两者的处境天差地别。众所周知，许多前囚犯终生都携带着牢狱的烙

印。即便获释后，他们仍会本能地重构那片狭小的空间，因为监狱早已渗透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影随形，紧附于肌肤之上。有些人甚至会美化这段经历，视其为某种意义上的“伊甸园”。让·热内（Jean Genet）便具备这样的天赋。那些他在监狱中结识的恶棍和罪犯，在他的笔下，摇身一变，化身为王子、贵族与才华横溢的诗人。男娼女盗在他的文字中，皆被赋予了尊贵与优雅，他们的言谈举止仿佛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或克莱芙王妃^②再世。此外，文学中还存在一个独特的“疗养院文学”传统，而其最高成就，莫过于托马斯·曼

（Thomas Mann）的《魔山》（*La Montagne magique*）。这部小说讲述了饱受挫折的爱情、躺椅上的激烈交锋，以及对山下那个即将滑向战争深渊的世界的冷峻谴责（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疗养院仿佛是一座蜂巢，社交在这里极为微妙而复杂，交往的尺度取决于肺部的健康状况与咳嗽的剧烈程度。在这个特殊的社交空间里，病人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终将被悄然送走的高贵病人；另一类则是顽强抵抗病魔并幸存下来的见证者。

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常常沉溺于日常琐事所带来的诡异而扭曲的快感，那种感觉，仿佛陷入沙漠流沙——缓慢下沉，难以抗拒。面对“如何不去生活”这一奥秘，不同时代、不同敏感度的人都曾给出过各自独特而微妙的答案。在众多回应中，瑞士作家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Henri Frédéric Amiel）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的这一“叙事性贫乏”命运的本质。这位日内瓦大学的美学与文学教授，耗尽毕生心力，写下了长达17,000多页的岁月长篇。在这部日记中，阿米耶尔以一种近乎强迫症般的细致执着，记录了那些微不足道、稍纵即逝的日常片段。每天的特征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几乎什么都未曾发生，唯一的区别通常只在于天气的变化。日复一日的魅力，恰恰隐藏在昨日与今日、今日与明日之间那微乎其微的差异之中——一种纯粹名义上的区别。万物在无尽轮回中不断重复，但每一次，都会带着细微却无法忽视的不同，使得每一天都显得独一无二。除了三餐这类生物性的规律活动能暂时打破时光的单调外，阿米耶尔写作的真正目的正是捕捉那些昙花一现的细节。阿米耶尔是个复杂而多面的人：作为知名学者与日内瓦大学文学教授，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过着一段隐秘而孤独的平行人生——一段由幻想织就的梦境人生。在这条“梦中之路”上，他沉浸于对未曾写就的书籍的构想、对未能娶到的伴侣的想象（他的情感生活极为贫乏），以及对从未启程的旅行的憧憬。作为一个执拗的优柔寡断者，他被“可能性的无限变幻”所吞噬，最终选择退居人生的幕后。那部细致入微的日记，成为赋予其人生意义的唯一舞台。世上并不缺少日记作者，但唯有阿米耶尔以惊人的执着持续书写着这份平淡之美，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平庸之王”。

莱芒湖即日内瓦湖。——译注

比起那位曾是伟大的战士与旅行者的德·梅斯特，阿米耶尔将对平凡的推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来，“微不足道”并非指乏味或琐碎，而是指尚未被赋予意义的事物。这是一种对细节的探索，一种以“微小之物”构建叙事的自觉选择。他的日记犹如一座纸上圣殿，供奉着一位将在自传体虚构文学中大放异彩的新神明——“微小之物”。他悉心描摹这些微不足道的片段，将它们精心演绎：心情的细微波动、琐碎的日常逸事、突如其来的头痛和消化不良、呼吸时的轻微不畅、莱芒湖^②上光影变幻时的恍惚眩晕，以及那些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微小伤痛——这一切看似平凡无奇，却共同构成了生命中那被忽视的日常散文。最终，这些点滴日常交织汇聚，凝结为一场静默而深邃的生活冒险。阿米耶尔痴迷于制订时间表，试图将未来囚禁在日历的牢笼中。他发现，要想填满时间，绝非易事。若无法真正做到，至少可以尝试精确地规划它，细化到每一分钟。他曾写道：“我整整连续花了八个小时，才制订出这个冬天的时间表。”这并不仅仅是一场为了逃避生活而精心策划未来的诡计，更是一种试图借助对未来的掌控感来逃避当下的策略。只要将时间以刚性的规划锢入僵化的日程表中，人便不再是茫然无依的过客，而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刻被期待、被认可的存在，一个能够逃避突如其来的变数之人。放眼当今文坛，阿米耶尔最杰出的精神继承者，当数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他那长达4000页的自传体巨著《我的奋斗》（*Min Kamp*）以极致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记录了生活的点滴，并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当代文化的深层偏好：人们越发倾向于追求真实，而非沉溺于虚构。

Gilles Deleuze, 《Bartleby ou la formule》, in Critique et clinique, Éditions de Minuit, 1993.

再看梅尔维尔（Melville）笔下的巴托比（Bartleby），那位曾经勤奋尽职的抄写员，最终却化作一只忧郁的滨螺。这位抄写员是19世纪文学中，最伟大的“消极英雄”之一，承袭了中世纪修士的衣钵。当他试图反抗命运时，就如同布瓦尔与佩库歇曾狂热地想要汇编那个时代的全部知识，最终只是疲惫不堪地回归了抄写员的本职工作。巴托比曾在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用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拒绝宣言：“我宁愿不做”（I would prefer not to），拒绝了上司的要求。这句奇特的否定式肯定曾令数代哲学家与文学家为之困惑：这位终日面对白墙的抄写员，最终以身死图圉收场。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小巨人”。这是一个苍白无血色的角色，他不同于布瓦尔与佩库歇——两人曾被贪欲般的求知冲动驱使——巴托比只是一个被分派到一张简陋的书桌前，从事简单事务的职员。巴托比的故事便是对“消极抵抗”的最真实写照：他以那种消极而固执的姿态、阴郁冷漠的傲慢将上司和同事彻底拖入了深深的疲惫与困惑之中，直至故事落幕，他依旧固守着那份平庸的古怪。这位抄写员之前曾在华盛顿的废信局工作，负责复制那些无处投递的信件，他复制生活，却从未真正体验生活。正

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他咀嚼的，是已经写就的文字。”

然而，这份机械的抄写终究令他陷入厌倦与麻木，他停下了手中的笔，赖在老板的办公室内拒绝离去，直至被驱逐。核对、誊写、传递——这份单调乏味的工作，曾是修道院中修士们的职责，在幽暗的书室中，他们将成千上万的希腊与拉丁文本，从遗忘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巴托比正是柏拉图洞穴与修士牢房的交汇点：在那栋19世纪灰暗的写字楼里，没有光影变幻，只有沉闷的尘埃；若生于今日，他或许会是某栋不知名的写字楼中，在开放空间或灵活工位上工作的程序员。巴托比以“苍白、呆滞、机械”的神情进行抄录工作。而每当上司或同事提出请求时，他便会以那句令所有人崩溃的话来回答：“我宁愿不做。”这份沉默，在办公室中引发了无数猜测与愤怒。渐渐地，这个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口中的“灵魂罢工者”放弃了一切工作，被逐出办公室，最终死于监狱的冰冷牢房。宁愿不做：这既是拒绝接受，也是否定拒绝；是一种选择“否定”，却未彻底切断与肯定的关联。这句话，是对所有其他话语的否定。最终，巴托比迎来了生命的永恒沉默。梅尔维尔并不仅仅是这部被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称为“庞大的小书”的作者，他更是那部描绘“流动的巨兽”白鲸莫比·迪克的《白鲸记》（*Moby Dick*）的创作者。如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一般，梅尔维尔在无限宏大与无限微小中发现了新大陆。而借助巴托比，他探寻了“微观的极致”，那种哪怕在苍白无力中也能展现出的强烈张力。

13 气象哀歌

斯多葛主义（stoïcisme）是一种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流派，由芝诺在公元前3世纪创立。该学派强调理性、自我控制和顺应自然法则，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解和接受现实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译注

引自du Tome XII du Journal, L' Âge d' Homme, Genève, 1984。

继让-雅克·卢梭和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之后，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开创了一种注定成为未来数个世纪主旋律的观念：天气与心境的交织共鸣。先是古代贤哲，后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都曾探讨气候对政治体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阿米耶尔则以近乎仪式般的执着，将天气观察系统化。在他的《日记》（*Journal*）中，每一则记录皆以天气描写开篇，仿佛唯有先聆听天空的低语，才能辨识内心的情感起伏：“天空灰蒙蒙一片，酷暑的烟斗似乎已被折断。”“阴冷无光的灰色天空，了无温柔与暖意，犹如男子未能鼓起勇气向爱人伸手、未能说出‘愿上帝护佑，您愿与我共度余生？’后所体会的苍凉。”“天空低垂，灰色帷幕轻褶，若有若无的薄雾在远山间徘徊；大地弥漫着秋日的忧郁。枯叶无声飘落，恰似青春最后的幻梦随不可名状的泪水悄然消逝……唯有那挺拔的冷杉依旧苍翠，犹如在这普遍衰萎中岿然不动的斯多葛主义^②信徒。”或是：“今日阳光洒满房间，大自然欢欣如节日般张开怀抱，秋意含笑。而我只能勉力回应它的殷勤问候。”^③

天气的变化总是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轨迹前行：它要么扰乱我们的情绪，要么与之共舞。它既是情绪的纠正器，亦是感受的放大器；它引导我们的行为，或促使我们迈步出门，或让我们打消启程远行、驶向大海的念头。气象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它从预测农田收成与航海气象的实用技术，逐步演变为探究人类内在情绪的科学。毕竟，所谓“心境”无非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微妙关联，一方是波动不定、脆弱无依的灵魂，另一方是永恒变幻、难以预测的自然。当我们习惯于感受温度的微妙变化、留意天空色彩的渐变层次时，气象学便成了一场关于“多样性”的教育：即便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至少总有雨水飘落、风声呼啸、阳光普照。天气，始终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最低限度的冒险。天气之魅力，恰在于它的无常——那如同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流动景象。它以细腻的变化磨砺我们的感官，使我们逐步适应一种“半色调”的伦理观念。气象学是感知力的导师。我们在四季轮回的交替中，体会存在的微妙脉动时，便会再次唤醒了古希腊宇宙的观念——自然万象与人类心灵彼此交织、息息相关。这种深刻的联结，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怀旧情怀。毕竟，我们如此渴望成为那更广阔秩序中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自20世纪伊始，便悄然出现裂痕：我们已从“气候理论”走向“气候失调理论”。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坚信地理决定论，断言温暖的南方会赋予人敏锐的感官与慵懒的惰性，而寒冷的北方则塑造出勤勉与严谨的性格。如今，这一理论早已被历史淘汰。当下的天气，不再仅仅是自然秩序的体现，还是人类自我放纵、肆意妄为所招致的后果。那曾连接人类与自然、微观与宏观的本质性纽带，如今已裂开一道深不可测的缝隙。气象学已不再是灵魂的晴雨表，而是人类非理性的体温计。它蜕变为——门风险预警学，甚至可以称之为恐慌科学。无论晴空万里，抑或阴雨连绵，天气的每一次变化，都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威胁正悄然逼近。从遥远的外部行星到人类内心的小宇宙，气象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为发达国家的享乐象征：夏日，它呼唤人们涌向沙滩；冬日，它引领我们驰骋雪场。而如今，气象主播微笑的背后，则是即将引爆的隐忧与潜伏的危险。极地冰盖的加速崩塌，阿拉斯加与格陵兰夏季不断刷新的高温纪录，得克萨斯州突如其来的极地寒流与暴风雪，这一切，连同这场气候的全面失调，正映射出我们内在的混乱与迷惘。世界，早已脱离原有的轨道。继卢梭之后，阿米耶尔被视为气象感受力的杰出代表。他曾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每一处风景，都是一种心境。”只是如今，我们的心灵早已支离破碎。

黑格尔曾说：“阅读日报就是我们每日的晨祷。”那么，天气预报便成了现代人日夜不息的祷告仪式。在多数国家，天气预报通常由年轻女性主持。她们的面部表情，仿佛是天气情绪的晴雨表——眉头微蹙，便是阴雨连绵、乌云压境；唇角上扬，预示着阳光明媚、温暖宜人。所谓理想的天气，应当是温和与反差的巧妙平衡。然而，一旦冷雨连绵、寒风刺骨，播报天气的主持人便成了“报丧使者”，被观众无情地指责为“晦气之源”。本世纪初，在某些东欧国家，气象女主播甚至在夏日前夕，于镜头前脱去外衣，以此传递即将到来的轻松与愉悦。然而，无论情境如何，天气预报始终是一场严谨而体贴的提醒：雪日霜冻，需添衣御寒；前往北欧，记得带伞；若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更需披上温暖的羊毛外套。只是，那曾经轻快幽默的播报语调，早已成为禁忌。如今，气候问题被视作一场全球性战争，而那些对气候危机不以为意的人，已被当作未来的罪人。每一次播报都必须带上深切的忧患感，否则便会被斥为对人类未来的漠视与无知。当天气预报开始时，响起的是为气候末日敲响的丧钟。曾几何时，气候紊乱与自然灾害仍是罕见而短暂的例外；而如今，季节的更迭却仿佛彻底失序：希腊的暴雪肆虐，加州二月的“冬季热浪”，气温竟飙升至30摄氏度，气象学家甚至为这一反常现象，取了个耐人寻味的名字：“愉悦噩梦”（delightmare）。阳光虽慷慨地洒落在你的假期，但它的背后，却始终潜藏着干旱或酷热的威胁。那片碧蓝如洗的天空，也不再令人安心，它或许正隐匿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气候炸弹，引发大火、暴雨与毁灭性的洪水。在气候危机面前，无人幸免——无论身处地球何处，即便是法国，也不例外。

Anouchka Vasak, *Grandes Émotions météorologiques collectives*, in Alain Corbin, *Histoire des Émotions*, tome 2, Seuil Histoire, 2016, pp. 115-116.

天气，便是世界的肌肤，是晨起推窗的那一刻，我们碰触的那件“原初衣裳”，然而，这层大气的肌肤却可能让我们感到莫名的不自在。有些人天生对空气中最细微的变化极其敏感，仿佛神经系统中潜藏着微妙的电流探测器。哪怕一缕轻雾、一抹霾色，都能在他们心中掀起一场折磨人的心理剧。1987年起，季节性情感障碍（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被正式收录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I）。气象学曾花费数百年时间，才从迷信与神话的桎梏中艰难脱身，为那些“神怒引发”的洪水、火山喷发与地震找到了理性的解释。^①而我们的身体就像被一个庞大的宇宙之躯包裹，引领我们随它的悸动、叹息与风暴而颤动；它将自身的病痛传导至我们的脉搏，却也曾慷慨地赐予我们短暂的晴朗与宁静。只是如今，这副“巨大的躯体”已陷入无法痊愈的病痛之中。现代文明粉碎了数千年来的生态平衡，而大自然正在报复我们的疏失。阳光能将我们的灵魂推向辽阔无边的幻境；铅灰色的天空，则令心脏收缩，气候失调所传达的讯息无比清晰：留在家中，非必要，勿出行。别再为一时的旅行冲动而徒增碳足迹。“流动性”这词听起来轻盈灵活，犹如口香糖般随意咀嚼，但它的潜台词是：请勿再越出限定的活动范围。过去，天空的躁动是个人的悲剧；而今，气候的痉挛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噩梦。人类，已被判了刑，时间所剩无几，年青一代正深陷“生态焦虑”的旋涡之中。他们的痛苦，仿佛与这颗濒死星球的剧烈痉挛息息相关。这颗载着我们的“宇宙小舟”，正以疲惫而痛苦的呜咽声提醒我们：人类，已不再属于这片大地。我们毁了我们的家园，也毁了我们自己。正如20世纪德国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er Anders）所说：“人类的过时已被宣告。”我们已从“革命时代”，走入了“灾难时代”。那曾无忧无虑的“黄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早已被时光封存，繁华与欢乐已然成为历史深处的冷灰。

古代仪式曾具有宣泄攻击性冲动的净化功能，而我们当代的世俗仪式却扮演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它们夸大现实、制造焦虑，让我们始终生活在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阴影之下。面对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我们是否能像这片大地上的许多民族那样，学会从逆境中汲取智慧？抑或，我们仍将一切寄托于国家，期望它如同哺育婴孩般呵护我们——喂养、安抚、指导、抚慰？气候灾害自古便存在。但过去，人类将它们归因于神灵的愤怒。如今，我们终于知晓了真正的元凶：人类世（l'anthropocène），以及人类的疯狂。全球变暖，已然成为解释一切的“瑞士军刀”——它能为风暴、暴乱、饥荒乃至恐怖主义提供因果解释。它与上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随时随地被引用，用以解释一切、控诉一切。它象征着科学话语与民间恐惧，乃至迷信的交汇融合。气象学早已超越了预测天气的科学

范畴，它俨然成了日复一日的“布道”。仿佛大地之母盖娅正通过这些极端天气，惩罚人类的贪婪与过度。透过气象播报，我们仿佛看到冷酷无情的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缓缓降临，为人类的集体罪行带来不可逃避的清算。

我们工业社会的无度妄行，已然酿成了飓风、瘟疫、海啸与台风（它们轮流被赋予男性或女性的名字，以免在称谓上冒犯任何群体）的肆虐。2020年3月底，前生态部长不是曾发出警告：新冠疫情是大自然对人类失控行为的最后警告，若我们无动于衷，前方等待的便是最后的审判。在每日例行的气象播报中，天气以其平淡的语调掩饰着潜藏的愤怒与复仇欲望——它无声地传达着我们必须承受的赎罪判决。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凭借自我约束与节制，扭转全球变暖的进程？这也正是人类世的核心命题。即便我们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但仍极有可能因气候系统的惯性，让这种失调的局势继续在未来数十年间肆虐不止。毕竟，我们尚且无法随心所欲地让雪花飘落、让雨水降临，又如何妄谈掌控整颗星球？事实上，在政治生态学中，依然潜藏着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世界观：一种将忏悔与妄自尊大交织在一起的信念。只要意志足够坚定，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我们无法立即扭转趋势的无力感，与对自身“全能”能力的盲目自信，只会激起末世论者更加深沉的愤怒与绝望。归根结底，若我们既无法主宰气候，又难以驾驭自我，何不选择驻足不前，归于室内？

14 存在失败主义

现代性中充斥着这些颂扬寂灭与沉眠的英雄，他们以惊人的惯性力量，将昏睡与懒惰奉为绝对价值。对他们而言，存在是一场持续的减法。真实的生活、渴望的风暴与激情的强度，皆是虚无的幻象，正如现代广告管理学热衷的口号——“你必须改变生活”。当现代性自浪漫主义，经由情境主义，乃至兰波的诗篇，一路执着于极致体验时，那些**减速主义者**（*Décélérateurs*）却毅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种带着宿命色彩的存在失败主义。通过选择不去生活，他们揭开了幸福理想表面那层厚重的玫红色涂层。他们拒绝扮演先知或反叛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更愿意做微不足道之物的守护者和主动不作为的代言人。他们并非光明或狂热痉挛的英雄，而是虚无的表演者，蓄意沉睡的信徒。最终，他们无意间构筑出一种**萎缩的浪漫主义**（*un romantisme du rabougrissement*），并将自我消解的任务打磨成了一项精雕细琢的事业。或许，当那种蛰伏般的生活魅力凌驾于其他诱惑之上时，这种自我缩减的计划在未来也会成为我们，或至少是部分人的选择。这种独特的逆转也主导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日内瓦教授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

（Serge Doubrovsky）所创立的“自传小说”写作形式：人们不再叙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而是借由写作来说服自己仍活着。他们在字句中拓展自我，并惊叹于那看似平凡的命运竟然蕴藏着无尽的丰盈。日记，或更准确地说，“微日记”，试图将整个现实尽数囊括于字里行间，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出一个与其同样漂浮不定的读者——那位“虚无之伴”。这种写作致力于每周收集微不足道的生活碎片，日复一日地盘点生活的平庸景象，实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必须分秒不息地维系自我，抵御那松散而慵懒的时间之浪，唯恐自我随之溶解。正如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所言：“我深邃如渊，一年365天，我体验着365种不同的命运。”将一天视作人类戏剧的完整舞台——这正是现代小说的核心母题。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再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直至当代的安妮·埃尔诺与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皆不例外。我们的日内瓦教授厌倦生活了吗？不然！这是一种高度活跃的厌倦——他耗尽所有能量，只为确保生活中绝不发生任何变化。当他沉入那令人眩晕的虚空的微观世界时，他猛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真相：平庸之境无边无际。即便是在这片狭小的领地上，我也毫无主权可言——我已不堪重负。不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艰巨的劳作。那些痴迷于微不足道之物的狂热分子，往往以令人咋舌的执着，完成着这场自我缩减的工程。退缩，原来也能成为一种令人沉醉的激情。

关于这一主题，可参见Madeleine Bouchez, *L'Ennui, de Sénèque à Moravia*, PUF, Bordas, 1973。

支撑这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确需要一份强烈的激情。独居者比旁人更容易被那位可怖的“无聊之神”俘获。这位无聊之神拥有惊人的侵蚀力，能悄无声息地磨蚀生活的起伏，将其逐步吞噬殆尽。它所唤起的隐喻，无不与沉陷、停滞和凝固相关：如波德莱尔与坡（Poe）笔下那艘被冰封、永远无法动弹的船；如福楼拜描绘的死寂无声的沼泽；如马拉美（Mallarmé）所刻画的冻结飞鸟的贫瘠冰川；如魏尔伦（Verlaine）与契诃夫（Chekhov）描述的冬雪覆盖的荒原；如莫拉维亚（Moravia）笔下因石灰沉积而堵塞的管道；以及萨特在《恶心》中所写的那种令人深陷、无法自拔的自然黏滞感。无聊，某种意义上就是被黏附在自我之中，找不到任何出口。存在从“存在”滑向“近乎存在”，时间则化作一股甜腻而空洞、失去意义的缓流。^①无聊堪称“间隙的病灶”，它如同冷凝胶般渗入时间的裂隙，冻结生机，遮蔽意识的深处，将存在压缩为两个虚无之间的苍白间隔。而社交网络的全球覆盖，更是将这种虚无感无限放大，弥散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俄罗斯，“外省”（la province）始终是无聊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的绝佳象征。它代表了一种平淡乏味、贴地而行的生活，一种无休无止的冬眠状态。数百年来，从契诃夫到萨特，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都曾竭力描绘这份令人着迷的沉闷。全球疫情封控期间，这种被困于四壁之内、灰暗而局促的生活，曾短暂地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体验。无论是穿着拖鞋还是运动裤，我们都被迫受限于规定的出行范围，失去了现实生活中一切与惊奇、未知和新鲜相关的乐趣。“外省”一词虽已逐渐过时，却仍偶尔为那股陈旧的反巴黎情绪添柴加火。然而，在那几个月里，真正被“外省化”的却是巴黎本身及其他大城市——它们变成了露天墓园，宛若一座座空无一人的电影布景。正如我们所见，日常生活的特征在于将一切调至“中性模式”，抹平内容，制造出一个模糊不定的空间，将爱意、情感与愤怒溶解在那层无色的胶质之中。于是，人们极易陷入这样一种诱惑，通过加剧和强化这份日常感来试图摆脱它。

生活中有一种微妙的魅力，便是任由自己随波逐流，如小船轻轻漂荡在河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单调的重复具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如诗歌般，那是由反复吟诵与赘饰堆砌所织就的迷离咒语。每小时、每一天看似相同，却又稍有不同。而这微不足道的“稍有不同”本身，便已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一个心跳般的不和谐音符。我何须渴求更多的变数？只要每天都能讲述同样的故事，哪怕仅是细节上的微妙差异，便已足够。这样的故事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犹如孩童时听过的童话——情节固然已知，却依旧百听不厌。尤其是当国家若肯仁慈地为我们提供基本收入时，我们或许会心甘情愿地将生活的方向与娱乐，交由日历与季节的轮转来掌控——它们既为我们指引方向，又为我们提供消遣。日常生活中自有一种镇静的愉悦，它赋予看似随意的事物以必然性。当生活被三餐、手机铃声、视频会议和电视节目的有序切换填满时，我们便进入了自动模式中。生活中的事件越是稀少，那些偶发的变故便越显珍贵，仿佛是命运偶然赐予的惊喜馈赠。

浪漫主义时期曾盛行一种炫耀式的无聊感，以此对抗资产阶级的忙碌与工人阶级的辛勤奔波。缪塞（Musset）所描述的“世纪病”，正是一种傲慢与温和的反叛交织的情感。虚度人生，成为一种与在卑微劳作中度日的凡俗之辈——无论是工人还是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象征，并自我标榜为精英阶层，即所谓的“幸福的少数人”（happy few）。在那个时代，承担痛苦意味着拒绝妥协。当富人沉溺于满足时，诗人则以闲散与苦闷来彰显自己的不幸与反抗。忧郁使这些“幸福的少数人”远离了再生产、速度与劳作的世界。公开表现出的无聊，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他们集体的歇斯底里。若对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表现出丝毫兴趣，便意味着向敌人妥协。艺术家与剧作家那苍白而痛苦的脸庞在无声地诉说着：“你们忙碌的世界与我无关，我另有归属。”

2022年，面对这个威胁丛生的世界，我们以一种崭新的“玩世不恭”的姿态作出回应——“酷”成为抗衡压力的武器，也是一种低调而高效的方式，用以标记自我与现实的疏离感。人们选择抽离、脱钩，却仍在生活的缝隙中与其周旋，以若即若离的漫不经心和刻意维持的距离感游走其中。我们置身于这悲剧性的世界，却不再剧烈颤抖，也不再流露出怜悯之情，而是借此掩饰内心深处的抑郁与恐惧。“酷”与“随和”已然成了生活中积极状态的代名词，却从未被赋予过多的重要性。人们逐渐练就了一种将情绪伪装成漫不经心的技艺。现代社会中充斥着这些假装慵懒的人：他们以疏离示人，仿佛是逃避与未完成的王者。他们的冷漠，犹如一种二流的斯多葛主义课程。他们主动为自己开设情感隔离疗程，以此拒绝老一辈人那种以反叛与激情为傲的夸张姿态——正是那个曾奉“突破禁忌”为圭臬的“婴儿潮一代”。这些人选择在家中展开“逃逸之旅”，实践“原地出走”，甚至将那份艰苦维系的努力巧妙地伪装成随性的洒脱。他们将内心的焦虑，转化为表面的平静。

即便是那些抗议气候变化的群众，在眼泪与愤怒的交织中，最终也只是呼吁人们留在家中，践行桑德琳·鲁索（Sandrine Rousseau）所倡导的“低流动性”和“去创新”。无论初衷如何，结局却殊途同归：公寓、独立住宅、社区乃至保卫区，都不过是“家”的变体，是与朋友或亲密之人共同隐居的庇护所，以逃避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这就是“避难于平凡”所蕴含的悖论：生活越是规律，个体对危机主旋律的感知就越敏感。紧急状态带来的异样快感，让我们在预测自身毁灭时，体验到一种悖谬的愉悦。太多怠惰的头脑热衷于讨论西方的衰落，却鲜少真正探寻疗愈之道。失败主义已然成为特权阶层的第二居所，犹如蜷缩在舒适之中的肥猫，用喉间低沉的咕噜声吐露着慵懒的叹息。末日言论原本意在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结果反倒催生了一种集体性的迟钝。极端天气、火山喷发、飓风、事故与恐袭，为我们平静的生活注入新奇的战栗感。敌人已然潜伏在我们身边，窥伺着我们最微小的失误。秩序与平静越是稳固，人们便越渴望进一步强化它们。我们从沉睡中惊醒，只是为了追求更深的麻木。我们从日常的中性中挣脱

出来，只是为了要求更为安全和封闭的生活。敲响警钟，便是为这乏味的日常重新注入戏剧性，那是一场以末日临近为名的全面封闭的幻想。可最终，回应一切的仍是那份无力的被动。然而，当真正的危机在2022年2月压境时，空谈再无意义。伪装与逃避在现实的威胁前顷刻消散。那个被千呼万唤的末日，终于叩响了我们的门扉：要么动员起来，要么被动地接受分崩离析。

15 日常的极端主义者

Enrique Vila-Matas, *Bartleby et Co.*, Christian Bourgois, 2000, pp. 53-54.

大拒绝 (Grand Refus) 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面对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时，拒绝参与其中，从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反抗。——译注

当19世纪与20世纪的众多作家致力于丰富生命的质感时，另一些人却执着于冲淡生活的色彩，悄然投身于让日常重新归于平庸的事业。他们是“无意义主义”的极端践行者，以退为进，巧妙地利用系统自身的逻辑加以颠覆。与虚无作战是一门讲求策略与敏锐的艺术，尤其是当战术本身不在于摧毁虚无，而在于放大它，直至彻底窒息其中残存的一丝生机时。这是一种全新的倒置幸福观——将非生活视为苦行，将无为视为宿命，在无休止的喋喋与沉闷中消磨时光，直至沉闷本身浓稠得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奇幻色彩。如果说主角只在紧急关头感受到生命的脉动，并将日常生活视为两次壮举之间的短暂插曲，那么，他所经历的却是被漫长的空白包围的死寂时刻。这些作家的思想至今仍在拒绝进步的群体中留下隐秘的印记，尽管这一传承始终鲜为人知。例如，在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市，曾有一座“布劳提根图书馆”，以纪念那位地下文学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 (Richard Brautigan)。他于1984年自尽，年仅49岁。这座图书馆专门收藏那些被出版社拒绝的英文手稿。^①（后来图书馆搬到了华盛顿州，并主要转为线上运营）。这些温和的叛逆者并未明确地对世界说“不”，也未曾摆出“大拒绝”^②的姿态，而是任由自己漂向他处，在“消极艺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甚至称不上是当代地狱忧郁的账房先生。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放弃生活——或是在爱情上，或是在荣耀上，或是在友谊上。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鲜为人知或被误解的文学传统——这群“琐事探险家”——如今却能与我们产生共鸣。他们用略显陈旧的语言，道出了过去两年间我们共同经历的现实，描绘了我们在全新背景下的生存困境。甚至，若不幸再度遭遇新一轮疫情，我们或许仍将重蹈覆辙。这些日常的极端主义者既不神化“否定”，也不奉“沉默”为圭臬——正如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 所批判的那种兰波式的沉默。他提醒我们，在过去，当一位绅士遁世归隐，远离尘嚣迎接死亡时，沉默曾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法。然而，这些极端主义者选择的却是一种“低调的伦理”。他们以潜伏的生活灰调对抗激情燃烧的狂喜。

他们并非失败者——这一称谓依旧让我们困于成功的逻辑之中。相反，他们更像是“缺席的骑士”，是“幽冥的礼赞者”。他们践行着佛罗伦萨·洛特里 (Florence Lotterie) 所谓的“自我缺席的伦理”。他们即便偶尔召唤微不足道

的事件（超现实主义通病的通病正是在于夸大琐碎的奇迹，将随处可见的偶然性奉为神迹），也并未将其升华为启示。幸福至少有两种形式（而不幸的变体却无穷无尽）：一种是扩张的幸福，推开窗扉；另一种是收缩的幸福，紧闭窗户，沉浸于前者所鄙夷的单调与宁静之中。前者在辽阔的天地间探寻奇迹，后者则满足于家居的微观宇宙。一边是无垠远方的魅力，一边是习以为常的小确幸。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既非彻底的探险者，也非纯粹的隐居者。而探险精神与封闭意识之间的较量，从未像今日这般激烈。

从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到米歇尔·维勒贝克，这些作家犹如讽刺性的“地震仪”，敏锐地记录着西方世界在渺小与绝对梦想之间的摇摆。跨越170年，他们见证了同样的信仰崩塌——对生命意义的信仰消散，以及同样一代“疲惫不堪却高度活跃”的人群所捕捉到的灵魂低气压。他们是现代世界疯狂的解药，是旧日革命幻想与技术乌托邦的反面克星。这些“新幻灭者”拒绝在过度疲惫与虚无感之间无休止地徘徊，而是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拥抱“虚无的立场”，自觉成为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所描述的“空心时代”的忠实信徒。

当住宅化作卡夫卡笔下的“地洞”，生活便围绕着加固藏身之所、深化自我埋藏展开，这不过是“一个为生存而掘出的洞穴”。安全，以无聊为代价；自由，以风险为代价。地洞的全部意义在于确保居住者享有绝对的安宁：哪怕是一粒沙子的掉落，都会令其神经紧绷；填补通道，封堵裂缝，成了他的日常。持续的噪声，即便只是轻微的啾啾声，都足以让他陷入恐慌：这究竟是塌陷的前兆，还是某种野兽在挖掘隧道？这座堡垒被包围，正因它是堡垒，本质上便以封闭和敌意自守。住在这地洞中的人，已然化作一只善于打洞的哺乳动物：“当暮年渐近，能有一座像我这般的洞穴，在秋日寒意袭来时提供庇护，实在令人安心。”然而，外界的敌意并不会因这封闭的庇护所而偃旗息鼓；这场与外部世界的对抗，终究无休无止。或许，现代社会的地洞已成为一种集体性虚构的避难方案。

请看这本神秘的小册子——《布鲁姆理论》（*Théorie du Bloom*）。这是一部匿名著作，据称作者与隐形委员会（Comité invisible）这一精英化的极左团体关系密切。它自诩为奥勃洛莫夫以及詹姆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中反英雄人物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的思想继承者。该书探讨的是一场正在沉沦的文明，其消遣方式不过是在“短暂的技术狂热与漫长的观望性乏力之间反复游荡”。再看看这些古怪仪式的朝圣者：从1982年到1991年，他们每年都会去法国科雷兹省法德斯小站，举办一场“平庸大会”。他们引以为傲的壮举，便是组织一场“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会议，以此来体验“毫无意义的现实”。唯一的插曲，便是等候每一班抵达的火车——一辆内燃机车——迎接新到达的与会者，并将他们带入另一群正在等待下一批与会者的队伍中。随后，大家再逐一送别这些人离开。会议严禁任何复杂的环节，也杜绝哪怕最微小的变故，

以免破坏这场极致空无的庄严仪式。随着年复一年的坚持，这场荒诞的仪式日益隆重，甚至开始举行祝酒会和宴席。人们还会将硬币摆放在铁轨上，以证明金钱的绝对平庸。在这个社会生活要求普遍节奏同步的世界里，这些“平庸主义者”却选择主动减速、刹车，甚至欣然沉浸在日常惯性的静止之中，以便将其推向荒诞的极致。

众所周知，依赖性的加深会导致思维的收缩，而这正是衰老的诅咒所在。熄灭生命本身仍是一项艰巨的劳役，正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位被囚禁在笼中的“饥饿艺术家”。在守卫的监视下，在观众冷漠的注视中，他坚持绝食，最终在极度衰竭中被释放。倘若无法体验强烈的情感，那便必须以极致的平凡填满生活，以免哪怕最微小的波澜，都足以为这乏味的存在带来一丝意外的趣味。齐奥朗（Emil Cioran）曾以其一贯犀利的笔触痛斥“存在的诱惑”。然而，要抵抗存在本身，又需要何等的傲慢——竭力抹除自我，攀登至虚无的高峰，对“否定”投以坚定的“是”，并将空无体验为一种绝对的确证。对激情的放弃最终演变为对放弃本身的激情。道德家尚福尔（Chamfort）曾说：“我害怕在未曾真正活过的情况下死去。”而这些“极简主义斗士”或许会冷笑着反驳道：“我希望在未曾真正活过的情况下死去。”将自我缩减至最微不足道的状态，原来也是一种严苛而执着的使命。

结语 沉沦抑或蜕变？

“无法邀微风入室，但仍须敞开窗扉。”

——克里希那穆提 (Krishnamurti)

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曾昭示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其核心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而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却步入了一个贫瘠的年代，太多派别试图将人类拖入倒退的桎梏。对生命的欢欣肯定、对异域世界的好奇、对自由漫游的向往，如今都成了可疑之物。年青一代每日所受的教育，仿佛是一堂堂精心编排的绝望课程。各方为定义当今世界的优先事项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对立的斗争：究竟是气候变暖、流行病、恐怖主义，还是战争才最为紧迫？无论恐惧的来源如何，其影响却如出一辙：世界各民族选择退缩，首要目标是自保，以免被历史洪流吞噬。在这样的氛围下，年青一代又怎能不被梦魇纠缠？他们不再相信未来，只能一头扎入洞穴，屏息蛰伏，静候世界的终结。对绝对安全的执念甚至会扼杀对他者的兴趣。世界的终结，首先是外部世界的消亡——是对共同生活失去兴趣。20世纪60年代那种对生命的贪欢早已不复存在：我们被要求冷却崇高，缩减野心，鼓励所有人沉溺于卑微的小确幸。对人生至善之乐的渴望被视为罪孽，甚至被谴责为一种对地球、国家、历史、道德、少数群体的冒犯。从2020年到2022年，法国的电波上挤满了传播忧郁的导师与悲观的卫道士，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说教，预言最严厉的惩罚：我们享乐太多，如今必须付出代价！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Folio
Gallimard, tome II, IVe partie, p. 434.

我们被引导回归自我，因为外部世界已成深渊。谨慎被误认为惰性，而人类似乎注定要被安置在温室之中。面对时代悲剧，若无逃避之径或正当借口，人们便难以长久立足。曾被视为自由最伟大的成就——私生活权，如今却演变为对公共生活实践的弃守。早在1819年，本雅明·康斯坦 (Benjamin Constant) 便指出，现代人的自由在于“私人享乐的安全”，然而，这种自由也潜藏着对政治的普遍冷漠。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论美国的民主》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它表达了对温和专制可能吞噬民主国家的担忧：“这庞大而如慈父般的权力……乐见公民欢乐，唯愿他们只沉溺于欢乐。它乐于为他们谋求幸福，却要成为这种幸福的唯一缔造者与至高仲裁者；它保障他们的安全，预见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便利他们的娱乐，操控他们的事务，引导他们的产业，调节他们的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那么，它为何不索性免除他们思考的烦扰，甚至生活的劳苦呢？”^②

内与外之间的张力，唯有在门扉半掩、气息流转之时方能焕发生机（正如国界——它们的存在并非为了割裂，而是为了更好地联结众生）。面对令人窒息的焦虑，我们应以优雅的冒险精神相抗衡。真正让我们强大的不是逃避，而是直面逆境的勇气。在封闭与开放的教条之间，我们应追求一种渗透性的中庸之道——在克制与勇敢之间把握恰如其分的尺度，唯有如此，冲撞方能孕育出创造。生命的韵味，正蕴藏于多重世界的交汇冲击与碰撞之中。正如维克托·谢阁兰（Victor Segalen）所言：“我曾不得不在铁锤与钟声之间踌躇抉择，而今才坦然承认，我真正收获的，是回响。”

要想继续与人类同胞和睦共处，并抵御那群自虐者与哀怨者的围攻，我们所需的不仅是才智，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望。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复兴，而就在不久前，西方民族是否仍具备这样的能力，尚未可知。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令衰老的欧洲措手不及。经历疫情重创后，欧洲已疲惫不堪，沉溺于普世和平已是全球常态，而非西方特例的幻觉。然而，欧洲以坚实的团结作出了回应，并未屈服。世人原以为会迎来慕尼黑式的绥靖，却看到了一种集体的丘吉尔式的觉醒。这位沉睡已久的美人，自柏林墙倒塌后便在梦游状态中徘徊多年，却在短短数日内苏醒。某些民族或许会沉睡，但他们也能在最严峻的考验后觉醒，甚至在苦难中重塑自我，并以令人敬佩的复兴为我们树立榜样。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强大，而我们的敌人远没有他们自诩的那般不可一世。对于那些沉溺于衰败叙事、以我们的卑微为乐、预言我们即将消亡的末世预言家，这便是最有力的反驳。

然而，我们仍需保持谨慎。战争如疾病，皆为双刃剑——它既能唤醒人，也能使人麻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所激发出的非凡团结，在这场地震般的冲击面前，恐怕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难以抵御天然气与石油价格的飞涨、通货膨胀的迅速攀升、日常生活的千头万绪，以及核威胁的阴影。说到拖鞋，便意味着舒适，同时也意味着退缩。人们甚至重启煤矿，置节制与环保理想于不顾。当最初的激情退却，怜悯的余温还能存留几何？为了避免全面冲突，向乌克兰强加一场不惜代价的和平，将成为一种强烈的诱惑——而这无异于文明世界的自我屈服。自由的代价往往过于高昂，尤其是对于那些早已摒弃战争、如今却被战争梦魇缠身的富裕国家。这是一场跨越多个战线的较量，唯有坚韧与毅力才能支撑到底。这场斗争的意义既直白又深远。

奥勃洛莫夫或许终将回归他的故土——那个今日被虚无主义与暴力吞噬的俄罗斯。俄罗斯人民在无力与恐惧中选择蜷缩于洞穴之中，唯有少数杰出的异见者敢于挺身而出，这一幕似乎再次印证了1839年卡斯廷侯爵（Marquis de Custine）那句令人战栗的评语：“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俄国人皆沉醉于奴役。”或许有一

天，独裁者会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或许是一个更为温和的政权，他们或将结束战争，尽管他们未必能撼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

究竟谁会赢得胜利？是投降的传教士胜出，还是抵抗的旗手占上风？我们应当相信年青一代。即便有部分青年沉湎于哭诉与自怨自艾，亦会有另一部分青年迎难而上，誓要开创未来，而非任其摆布。

终局未定。

但若退让，注定失败。